



內外縱橫

太古樓

太古樓與薄扶林區歷史發展

夏其龍 編

目 錄

3 譚序

4 陳序

5 「內外縱橫太古樓」圓桌會議文集

6 丁新豹 | 薄扶林區與太古樓歷史發展概覽

14 夏其龍 / 溫國珩 | 論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薄扶林區的傳道及慈善工作

20 林雪碧 | 明之剛神父小傳

28 洗昭行 | 一個社區工作者眼中的明之剛神父

32 林 杰 | 「內外縱橫太古樓」圓桌會議主題文章回應

35 「太古樓之友」雜憶

36 陳忠明：「同」樂「童」趣太古樓

42 陳詠梅：太古樓歲月忘憂

48 蘇約翰：太古樓情 點滴存菁

54 太古樓的人和事

57 一位太古樓媳婦的回憶

59 太古樓十八號二樓

61 樂鋒會的點滴

63 常常祈禱，事事感恩

64 仁愛在我心 — 明神父與太古樓

66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68 從天堂來的善牧 — 明神父與我的童年

70 我敬愛的明之剛神父

71 明之剛神父對我的影響

72 滿臉笑容

72 明神父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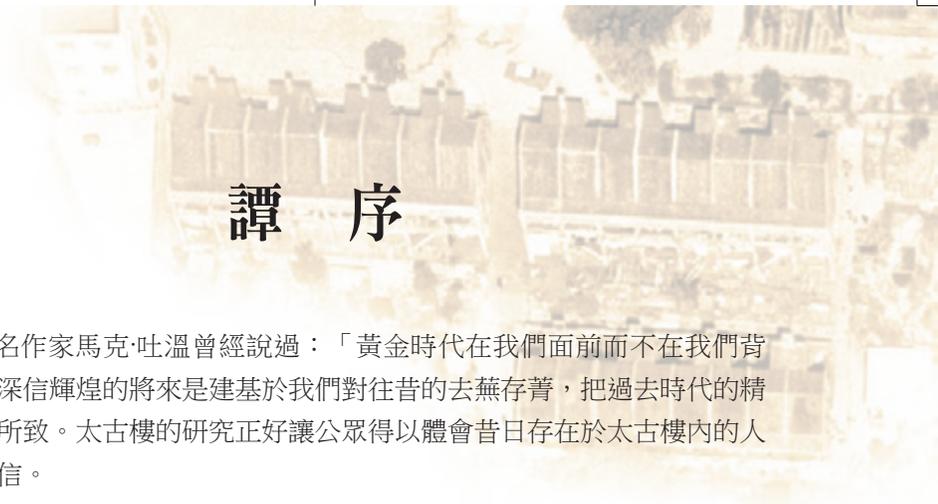
73 明之剛神父 — 我的模範

74 「尋找明之剛神父的足跡」法國朝聖之旅

80 跋

82 附錄（一）：互動小劇場

91 附錄（二）：太古樓模型



譚序

美國名作家馬克·吐溫曾經說過：「黃金時代在我們面前而不在我們背後」。筆者深信輝煌的將來是建基於我們對往昔的去蕪存菁，把過去時代的精華帶進未來所致。太古樓的研究正好讓公眾得以體會昔日存在於太古樓內的人文精神：互信。

香港現正面對著不同的經濟考驗、政治風波、社會矛盾，這些都或多或少與企業誠信、政治誠信、個人誠信有關。似乎人與人之間逐漸不能建構出互信關係而只有法律條文的維繫。

縱然太古樓已拆，然而，我們的研究致力重現昔日太古樓的人與事。透過四篇主題文章，我們讓讀者得以明白太古樓的歷史，從而對太古樓有一初步認識；透過口述歷史訪談，我們能夠感受太古樓居民之間，即人與人之間的情。居民能夠互愛是基於他們能夠互信，盼望讀者回味箇中的細節時，亦可以學習太古樓所呈現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需要一個空間去孕育。太古樓是一個空間，而這個空間保護著與它有回憶的人。在居住空間上，居民在太古樓能夠安居、樂業；在生活空間上，兒童能夠無拘束的享受童年時光；在思想空間上，活在教友村中，居民能對天主教信仰作出更廣更深的追求。

「人行猶可復，歲月哪可追？」時間的確一去不返，因此我們更需要重構歷史，讓我們可以回憶過去。這亦是太古樓研究的意義所在。但是，歷史研究絕不能止於此，重要的是能否讓讀者學習歷史，反思現在，重新踏上往昔先賢的腳蹤。

譚永亮

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

陳 序

香港天主教會訂2011 - 2012為教友年，再次提醒每一位天主教徒，跟隨主耶穌基督是一份喜樂、也是一份使命。其間，一個廣為人知的口號是：成聖自己，聖化他人，轉化世界。

作為基督信徒，作為一個信仰團體，我們共同的目標是成聖 — 成為聖人。而共同的使命，就是福傳使命。

教友年中，我們常常強調生活見證的重要。為強化昔日太古樓居民的信德，重燃他們的信仰心火，於是，在2011年2月開始，我建議太古樓之友團體，計劃展開了一連串的培育和回應行動，一連串的信仰尋根之旅。

首先，我們公認明之剛神父是我們共同的恩人和學習對象，為能夠有系統去認識明之剛神父之福傳歷史，我們特別邀請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 夏其龍神父，協助我們全面性地計劃。

我們曾於2011年7月往南丫島舉行一個名為明之剛神父尋根之旅；因為明神父曾在此島展開了廣泛的福傳工作，並建立了一間露德聖母幼稚園，當日我們懷緬過去之餘，亦使我們更加了解作一位傳教士的辛勞。

至於「細說太古樓」資料單張，已印制一萬份及公開派發，幫助更多人認識太古樓之歷史。

另外，亦於2011年9月15日及22日舉行了「教友村歷史講座系列」，探討太古樓及薄扶林區的歷史面貌。經過多方面的準備，分享及交流，這本綜合性的新書，名為「內外縱橫太古樓」將會面世，相信有關內容能夠幫助讀者，對太古樓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和了解。

今年2012年5月，我們亦舉辦了明之剛神父法國尋根之旅，期望了解明神父之家鄉，其出世及成長的地方。朝聖團友有幸地得到明神父之親友及市長們熱誠的款待，建立了兩地的友誼橋樑。

「生命影響生命」，期望明之剛神父的福傳精神，能夠藉著不同的活動傳承下去，使基督的福音能夠得到廣傳，使人的生命質素不斷提升，並使更多人欣賞到上主的奇妙化工。

太古樓之友
陳志明
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內外縱橫太古樓 圓桌會議

文集

天主教研究中心於2011年9月起開展了兩個系列的公開講座及多次考察導賞團，並於2012年7月7日舉辦了一個名為「內外縱橫太古樓」的圓桌會議，作為「太古樓與薄扶林區歷史發展」研究計劃的總結項目。

薄扶林區與太古樓歷史發展概覽

丁新豹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

6

一、引言

太古樓是一個與筆者甚有淵源的地方。筆者童年時，受父親的一位友人鼓勵，經常與母親於週日到太古樓參加彌撒，筆者的天主教信仰亦是從太古樓而起。事實上，礙於年幼，筆者在當時根本不知道太古樓原是一條教友村，只是覺得包括父親朋友在內的太古樓居民對信仰十分認真敬虔。太古樓今天已經成為歷史陳跡，成為了人們心中的回憶。隨著回憶的消逝，太古樓的歷史重構的意義顯得更為重大。

太古樓位於薄扶林區，回顧歷史，薄扶林區有很多重要的歷史建築，例如：牛奶公司、伯大尼療養院、薄扶林水塘、德格拉斯堡等等。然而，太古樓的這段歷史卻靜悄悄地隱藏在其中。太古樓不是一個自給自足封閉形的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與外界關係密切，太古樓的興盛因而亦與薄扶林區的發展息息相關。因此，了解薄扶林區的歷史發展能夠有助我們進一步了解太古樓的歷史發展。

以下筆者嘗試以一個概覽的方式將薄扶林區以及太古樓的一些重要的歷史片段以及個人研究心得透過本文與讀者分享。本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筆者會先簡介薄扶林村的歷史地理背景；第二部分筆者主要概述牛奶公司與薄扶林以及太古樓的歷史關係；第三部分筆者嘗試分析太古樓興盛的過程。

二、薄扶林早期歷史地理

薄扶林區最早以其鄰近瀑布灣（Waterfall Bay）的瀑布聞名，這是因為在香港開埠初年有很多來往來廣州經商的歐洲船隻會到瀑布處提取食水。亞美士德使節團（Amherst's Embassy 1816）副使亨利·艾利斯爵士（Sir Henry Ellis），在一次航行中，有以下的一段記錄：

「The situation of the watering place is picturesque. A stream of water falls down the mountain from the island and the casks may be filled when the tide serves, close to the beach.」¹

從以上描述可見，瀑布處不但景色優美，而且因其有充足的水源，吸引航行者的注意。在整個薄扶林區中，筆者相信薄扶林村的歷史發展應是最悠久。1819年，舒懋官、王崇熙編纂《新安縣志》，於官富司轄下村莊中有香港村、黃泥涌、薄覺林。²薄覺林即今之薄扶林，「覺」即是野鴨。村中以黃、羅、陳三姓為主，他們皆由寶安遷來。

對於坊間認為早期薄扶林村的村民是昔日逃避三藩之亂的難民，筆者認為此說值得商榷。首先，1688年靳文謨修、鄧文蔚等纂的《新安縣志》中，出現了黃泥涌的名字，卻未見有薄扶林的記載。³由此，我們可以推斷，薄扶林村應該形成於1688年至1819年之間。三藩之亂發生在1667年至1681年間，若然薄扶林村的形成是因三藩之亂二千名難民南下所致，那麼在1688年的《新安縣志》中，按理應該會有薄扶林村的記載。

其次，筆者認為二千餘人的說法誇張存疑。考查1841年香港的人口統計，全港約有七千餘人定居，當中只有赤柱人口接近二千人，其他地方除了



七十年代的薄扶林村

筲箕灣有一千二百人之外，其餘的人口平均是幾十至幾百，⁴因此，說有二千餘難民定居於薄扶林村，似乎仍待考證。再者，若考據難民一般的逃走路線，二千人一起逃難至香港島的機會實在不大。因此，坊間對薄扶林由來的說法，並不能盡信。

然而，在前述1841年的人口統計中，薄扶林一帶卻不在其中，箇中原因值得考究。

開埠初年，薄扶林區（District）指的是香港島以南由摩星嶺（Mount Davis）至香港仔（Aberdeen）一帶，由於當時發展相當緩慢，大多都數市民都是定居於薄扶林村之中。考查1872至1931期間的人口統計報告，薄扶林由原本的388人，增長到2293人，其中人口的驟增與牛奶公司的建立有關。⁵

三、牛奶公司在薄扶林

牛奶公司（The Dairy Farm Company Limited）於薄扶林整個歷史發展中佔了重要地位，如前述隨著牛奶公司在薄扶林區購地接連興建牛棚，公司對工人的需求愈來愈多，這直接導致薄扶林區的人口在1911年起開始驟增。再者，太古樓亦有居民替牛奶公司打工，而鄰近太古樓、充滿居民童年回憶、他們口中的「洋草山」實為牛奶公司種植牧草的地方。以下筆者將加以闡釋其中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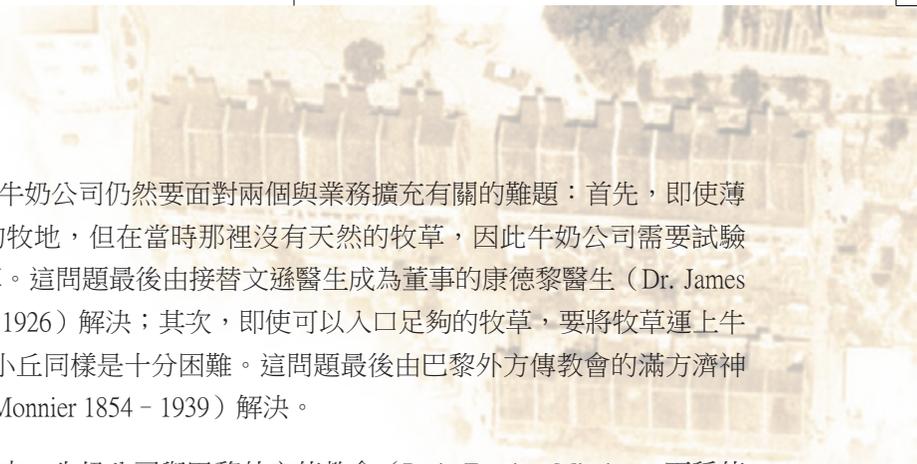
牛奶公司的創辦人為文遜醫生（Dr. Patrick Manson 1844 - 1922），早在19世紀中，他體會到若然香港沒有一間現代化的牛奶公司，牛奶很多時在生產過程中會受到感染，最後反而危害人們的健康。⁶因此，文遜醫生一方面希望提供質素高的牛奶給大眾，使之能夠增加大眾的抵抗力，另一方面是希望牧場能以低廉的價錢發售牛奶，使之成為社會上貧苦大眾的其中一樣日常食糧。⁷

牛奶公司在1886年創立，最初只有由六名股東，其中文遜醫生為第一任主席，其餘五位股東分別為：金融家遮打（Paul Catchick Chater）、香港總商會主席賴里（Phineas Ryrie）、股票經紀廈普（Granville Sharp）、兩位保險主任雷爾（William Henry Ray）、格狄（James Billington Coughtrie）。從董事的背景可見，他們都是一班經濟實力雄厚，且在公司管理方面有相當經驗的人，因此，不難想像牛奶公司的發展很快就可以上軌道。

在牛奶公司創辦僅數年後，其業務發展相當迅速，公司需要在港物色適合的牧場以擴充業務。薄扶林區成為牛奶公司購地發展的目標，原因有三：第一、薄扶林接近市區，方便運送牛奶；第二、薄扶林遠離貧民區，牛群受到致命細菌感染的機會減低；⁸第三、在牛奶公司成立的數年，所有牧草基本上需要由海路入口，然後運上山上的牛棚，薄扶林沿海，能減輕運輸成本。



牛奶公司牧場



然而，牛奶公司仍然要面對兩個與業務擴充有關的難題：首先，即使薄扶林有足夠的牧地，但在當時那裡沒有天然的牧草，因此牛奶公司需要試驗種植新的牧草。這問題最後由接替文遜醫生成為董事的康德黎醫生（Dr. James Cantlie 1851 - 1926）解決；其次，即使可以入口足夠的牧草，要將牧草運上牛群住的350尺小丘同樣是十分困難。這問題最後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滿方濟神父（François Monnier 1854 - 1939）解決。

縱觀歷史，牛奶公司與巴黎外方傳教會（Paris Foreign Mission，下稱傳教會）在早期有三次重大的交流。第一次，如前述滿方濟神父幫助牛奶公司解決了運輸牧草的困難。1903年牛奶公司經理獲加（James Walker）看見滿方濟神父正建築一登山索道以將印書館的書籍及紙張來回運送，後來獲加見登山索道運作流暢，於是邀請滿方濟神父替他們建造一大型登山索道。⁹第二次，前述牛奶公司在發展數年後，已經需要增購牧地，公司的目標之一是向傳教會收購利牧苑（Claymore）以及其附屬建築物。第三次，1917年牛奶公司希望收購香港冰廠（Hong Kong Ice Company），這需要當時的股東集資，而當時願意集資的股東之一就是巴黎外方傳教會香港司帳羅拔神父（Fr. León Robert）。¹⁰從以上三次較重要的交流，可見在土地供應上、物資運送上、公司管理上，牛奶公司與巴黎外方傳教會都有一定關係。

隨著牛奶公司發展薄扶林區，這一帶的人口有顯著的增加，特別在1911年以後。1921年的人口統計報告指出薄扶林區有大量人口依賴牛奶公司維生，¹¹因此，可以說牛奶公司是薄扶林早期發展的關鍵。對於薄扶林區的居民特別是薄扶林村以及太古樓的居民來說，牛奶公司與他們關係密切，一方面有些居民會替牛奶公司看守牛隻、當牧童、當司機、當電話接線生等等；另一方面，種滿牧草的「洋草山」是太古樓居民童年的回憶所在地，他們經常會到洋草山及牛棚嬉玩。從這兩方面可見，在市區發展上牛奶公司是一推動力；而在社群發展上，牛奶公司是一個社群集體的共同回憶。

四、「太古樓」之興盛過程

太古樓的歷史隱藏在薄扶林區之中，綜觀太古樓的歷史，其興盛與肋納匝印書館（Nazareth Press）的去留有直接關係。太古樓設立的目的是為了使印書館的員工有宿舍可以居住，然而在1954年印書館關閉後，太古樓原來的功能開始喪失，最後經教區考慮，在1976年將其地段售予地產發展商。

事實上，早在巴黎外方傳教會在香港興建肋納匝修院（Nazareth Seminary）及印書館前，傳教會已經在1875年於薄扶林興建了一間為遠東傳教

士而設的療養所，即後來的伯大尼療養院（Bethanie Sanatorium）或伯大尼修院。傳教會在當時希望利用薄扶林區以至整個香港去援助亞洲區的傳教士，¹²他們有意為遠東區的傳教士提供一個治療及休息的地方。修院由會長奧塞神父（Pierre Marie Osouf 1829 - 1906）設計，白德禮神父（Charles E. Patriat 1828 - 1887）協助施工，1875年建成。在1949年至1950年間，修院曾接待過從內地逃難到香港的神職人員，成為他們暫時的避難所。修院一直照顧需要療養的神職人員直到巴黎外方傳教會淡出香港。1875年至1975年這百年間，修院共接待過來自亞洲的 6,000名教士，共有101名教士在此去世，平均每年有一名身故。¹³1974年，修院出售，後來由香港政府管理。2003年，立法會批准香港演藝學院復修伯大尼修院，將其改建作為轄下電影電視學校舍，並開放予市民和遊客參觀。

除了如前述巴黎外方傳教會透過療養所支持遠東區傳教工作之外，他們還打算興建一大型的印書館，目的是透過書籍，把福音遍傳各地。¹⁴納匝肋印書館最先成立於澳門，1884年，羅若望神父（Jean Joseph Rousseille 1832 - 1900）、滿方濟神父、河神父與比神父四人在澳門興建了聖珊澤宮（Santa Sancha）作為納匝肋修院的院舍。¹⁵他們後來為了給傳教士安排數小時工作，於是在聖珊澤宮附近設立一印書館，讓印製的書籍可以支持傳教士在各地方的牧靈工作。然而，隨著葡萄牙政府對非葡裔天主教教士的政策改變，羅若望神父等明白在澳門繼續發展納匝肋修院及印書館有一定的限制，於是決定將發展資源從澳門轉移到香港。¹⁶

1885年，羅神父等從太古洋行（Swire）手上購入利牧苑，用以建設修院以及印書館。利牧苑最初是指在利牧徑（Claymore Avenue）上的一座屬於太古洋行的高級職員宿舍。¹⁷由於它屬於太古洋行，因此，村民習慣上稱它為「太古樓」。到了1885年，巴黎外方傳教會從太古洋行購入利牧苑，用作納匝肋修院及印書館。1891年，由於利牧苑一帶熱病流行，修院及印書館暫時搬遷到堅尼地城附近的列治文台（Richmond Terrace）。1894年，巴黎外方傳教會購入德格拉斯堡（Douglas Castle）作為修院及印書館新址，原來的利牧苑不再用來印刷書籍，傳教會因而向牛奶公司出售所在土地及建築物。然而，巴黎外方傳教會在利牧苑附近建造印書館員工宿舍，讓在印書館工作的天主教員工得以居住，他們的宿舍因而承襲了「太古樓」這名字，而太古樓教友村的歷史亦由此而開展。

巴黎外方傳教會購入德格拉斯堡，將其改建為納匝肋修院及印書館，其目的在於讓傳教士能夠在修院內短期靜修，然後回到工作崗位繼續其傳教的工作。修院的規則曾記載：



圖(一)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Nazareth House is to provide all the members of our Society (MEP) who have the desire and the authorization, with a suitable place to live in silence, in prayer and in meditation. The second aim of such an institution is to pray every day especially for all and for each of our missions」¹⁸

除了靈修的用途，修院亦發展其印務的工作。1909年修院加建了東翼印書館，並增購大量印刷工具，擴大其印刷的工作。按1922年的報告，印書館聘用了50名員工，每天出產約七萬頁印刷品。印刷的書籍以拉丁文為主，佔百分之三十七；其次中文，佔百分之二十五；法文佔十九；越南文佔十四。1924至1925年印書館出版的書目已經列出超過800本書，¹⁹當時的《南華早報》亦對印書館有正面的記載，²⁰這些繁重的印務工作需要大量的印刷工人。這些工人來自各地的天主教村落，但都以太古樓作為宿舍。²¹

對於太古樓的居民來說，印書館與他們關係特別密切。一方面，太古樓的居民多數曾在印書館工作過；另一方面，印書館的員工付出勞力在館內工

作，而印書館則為員工提供宿舍居住，員工宿舍慢慢就成為太古樓整個建築群的核心。居民有的在印書館負責印刷的工作，有的則負責修院木工、維修、燒飯以及清潔等工作。印書館培訓了一部分太古樓居民，使他們從不懂印務，到變成擁有一定印刷的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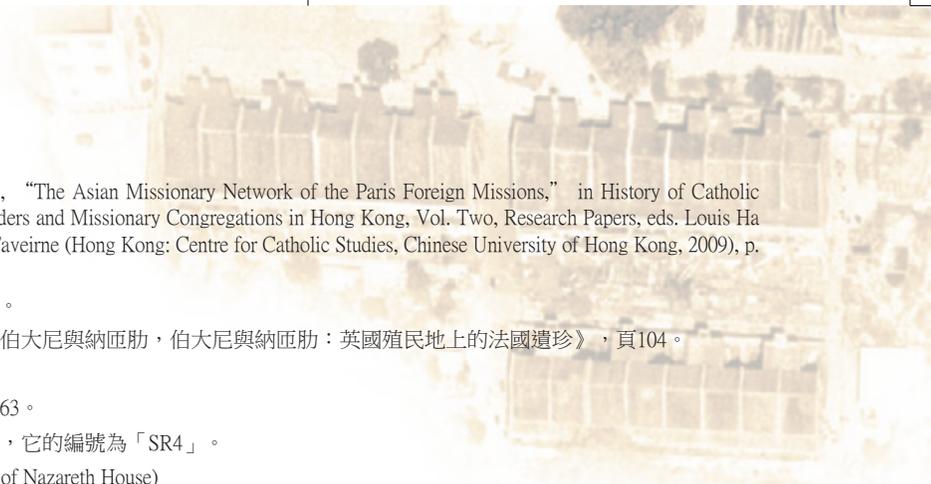
12

1953年，巴黎外方傳教會淡出香港，書館結業。1954年底，香港大學宿位不敷應用，於是向巴黎外方傳教會購入納匝肋修院，用作男生宿舍，大學後來拆除東翼印書館，將原址部分改為停車場。至於太古樓，1954年，巴黎外方傳教會將太古樓的業權轉讓給香港天主教教區。1976年，香港的經濟開始起飛，中產階級的人數開始增加，他們對住屋質素的要求亦相對提高。薄扶林一帶地段吸引地產發展商，教區為了籌集更多資金供應不同堂區的需要，於是將太古樓賣給發展商，同時協助居民搬遷。1978年太古樓被拆卸，原址今為薄扶林花園。

五、總結

歲月如流，時光飛逝，昔日綠草如茵的奶牛哺養場已變身為高樓大廈，獨特的公教村——太古樓已舊蹟難覓，納匝肋印書館及伯大尼幸運地得以保存，雖然原來的精神內涵已有所改變，但尤其難得的是已有二百年歷史的薄扶林村仍得以保存，成為香港島上碩果僅存的古村，這實在是香港城市發展的奇蹟。

1.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2. [清]舒懋官、王崇熙編纂，《新安縣志》卷二，(香港：出者不詳，1982)，頁35。
3. [清]靳文謨修、鄧文蔚等纂，《新安縣志》卷三，(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頁254。
4. 詳見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for 1841.
5. 詳見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for 1872, 1931.
6. Nigel Cameron, The Milky Way : The History of Dairy Farm (Hong Kong: Dairy Farm Co. Ltd, 1986), p. 28.
7. 同上註。
8. 同上註，頁34。
9. 樂艾倫，《伯大尼與納匝肋，伯大尼與納匝肋：英國殖民地上的法國遺珍》(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頁104。
10. 同上註，頁105。
11. 詳見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for 1921.

- 
12. Bruno Lepeu, "The Asian Missionary Network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in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Vol. Two, Research Papers*, eds. Louis Ha and Patrick Taveirne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p. 93.
 13. 同上註，73。
 14. 樂艾倫，《伯大尼與納匝肋，伯大尼與納匝肋：英國殖民地上的法國遺珍》，頁104。
 15. 同上註。
 16. 同上註，頁63。
 17. 參圖（一），它的編號為「SR4」。
 18. (Regulations of Nazareth House)
 19. 樂艾倫，《伯大尼與納匝肋，伯大尼與納匝肋：英國殖民地上的法國遺珍》，頁88。
 20. 1934年11月28日的南華早報 (South Morning China) 中，有以下的一段記載：「If during the fifty years since its foundation, Nazareth had done no other work than publish 28 dictionaries in 12 languages, some of them completely pioneering work, and four of them crowned by the French academy, Nazareth would have occupied a unique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s intellectual activities: yet the 28 dictionaries are only a portion of the work turned out in 28 languages No commercial house could have faced the financial loss entailed. Something for Hong Kong to be proud of」
 21. 樂艾倫，《伯大尼與納匝肋，伯大尼與納匝肋：英國殖民地上的法國遺珍》，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頁61，86。

論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薄扶林區的傳道及慈善工作

夏其龍、溫國珩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座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14

一、引言

巴黎外方傳教會（Paris Foreign Mission，下稱傳教會）在薄扶林區的傳道工作是對外而非對內的。綜合文獻資料，傳教會希望利用薄扶林區為遠東傳教事業作支援，區內的傳道工作則因而相對較為次要。薄扶林村雖然鄰近太古樓，但是卻只有一小部分村民信奉天主教信仰，這是因為一方面，傳教會在這區將資源集中在建設天主教社區——太古樓身上，沒有刻意要在薄扶林村內廣傳福音；另一方面，大部分村民有相同的民間信仰，形成一股抗拒天主教的張力。

雖然地區傳道不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工作焦點，然而，因著其慈善工作，薄扶林區的居民慢慢增加對傳教會的了解。另外，隨著太古樓的居民與周邊地區居民的日常交流增加，傳教會及天主教信仰因而得以被更多人認識。在薄扶林村的整全歷史中，巴黎外方傳教會在這區的傳道及慈善工作乃是重要的，特別是當明之剛神父出任露德聖母堂主任司鐸之後。

文章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筆者將指出巴黎外方傳教會與薄扶林區的關係；第二部分將主要探討教會如何透過教育、醫療兩項主要的慈善服務與薄扶林村建立關係；最後一部分筆者結合過去對太古樓的研究，抒發對保育薄扶林村醫療站的意見。

二、巴黎外方傳教會與薄扶林區

1875年至1954年這段時間，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薄扶林區興建了不少建築物，然而，筆者認為傳教會對薄扶林區的傳教態度是被動的，這是因為傳教會希望利用薄扶林以致香港去援助在亞洲區傳教的傳教士。¹其時在該區興建的建築物主要包括：伯大尼療養院（Bethanie Sanatorium）、納匝肋修院（Nazareth Seminary）、納匝肋印書館（Nazareth Press）、太古樓、露德聖母堂（Our Lady Lourdes Church）等。筆者以下將透過圖表方式，嘗試從上述建築物的建築原意及其功能，指出它們都不是為了在薄扶林區廣傳福音而設。

建築物	興建原由	興建過程	建築物之功能
1. 伯大尼療養院 ²	奧塞神父 (Pierre Marie Osouf 1829 - 1906) 認為遠東地區缺乏一間為傳教士而設療養所。	修院由奧塞神父設計，白德禮神父 (Charles E. Patriat 1828 - 1887) 協助施工，1875 年建成。	每年平均接待超過 60 名傳教士，為他們提供治療及提供休息的地方。
2. 納匝肋修院 ³	羅若望神父 (Jean Joseph Rousseille 1832 - 1900) 受託創立修院，旨在使教士靈性復甦，以及建立一個修院式社群。	1894 年，巴黎外方傳教會購入德格拉斯堡 (Douglas Castle)，將其改建為納匝肋修院。	修院規定傳教士每天定時的專心集禱、崇拜、默禱以及適量的勞動，使他們心靈得到休息。
3. 納匝肋印書館 ⁴	滿方濟神父 (François Monnier 1854 - 1939) 負責創立印書館，目的是通過書籍，把福音遍傳各地。	納匝肋印書館於 1896 年建成。1908 滿方濟神父決定擴建印務大樓，是為印書館東翼。	印書館一方面讓在修院靈修的傳教士有實務可作，另一方面印製的書籍可供亞洲地區傳教士傳教之用。 ⁵
4. 太古樓 ⁶	巴黎外方傳教會興建太古樓使之成為納匝肋印修院及印刷館之員工宿舍。	1885 年，巴黎外方傳教會從太古洋行購入利牧苑 (Claymore)，用作早期的納匝肋修院以及印書館。1891 年，由於利牧苑一帶熱病流行，修院及印書館暫時搬遷到堅尼地城附近的列治文台 (Richmond Terrace)。	太古樓從員工宿舍慢慢擴展。傳教會以其為中心，興建不同的建築物，整個建築群最後變成一個村落。
5. 露德聖母堂 ⁷	在 1935 年，太古樓的居民人數接近三百人，巴黎外方傳教會有意興建新聖堂以應付教友需要。	露德聖母堂於 1938 年建成。	除了參與彌撒外，居民還在露德聖母堂領洗、舉行婚禮以及葬禮等儀式。

從以上建築物的興建原由及其功能可見，它們都是為了方便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的靈修、療養及傳教而設。伯大尼療養院、納匝肋修院以及納匝肋印書館是為了輔助遠東地區的傳教工作而建。事實上，上述三座的建築物幫助了香港，使之成為亞洲區傳教網絡的樞紐，不論在傳教士的經濟上、行政安排上、身心照顧上以及傳教書籍物資上等等都為他們提供援助。⁸ 教士在薄扶林區傳教只可說是附帶的工作。

至於太古樓及露德聖母堂的設立，其原意也不是為了在薄扶林區傳教。太古樓是修院以及印書館的職員宿舍，其周邊後來加建的建築群包括了聖堂、小學、女修院、神父宿舍等等，全是為了員工不同的生活所需而加建，非為地區傳教而設。在 1952 年明之剛神父 (René Chevalier 1909 - 1981) 出任露德聖母

堂的主任司鐸前，太古樓對外的關係相對封閉。此可證於明神父後來說他希望將太古樓改變成為全個薄扶林區福音的傳播中心，打破太古樓這個基督社群與外界的隔絕。⁹

16

然而，由於這個基督社群不能自給自足，居民日常生活物資需要從外補給，而供應太古樓的正是薄扶林村，因此明神父有意進一步對外開放太古樓，將福音傳到附近的華人村落，¹⁰而教育以及醫療服務正好幫助教會拉近與這些村落的關係。

三、教會的教育、醫療與薄扶林村

由以上可見，巴黎外方傳教會對於區內的傳道工作的態度是被動的。1952年明之剛神父出任露德聖母堂的司鐸，他銳意以積極進取的態度傳教。他希望區內可以有更多人認識天主教信仰，於是他以身作則，透過有限的慈善服務，將天主教信仰宣揚。對於整個社區，明神父進行了不少慈善工作，例如他會到大口環兒童醫院探訪病童、他會向富裕人家募捐物資，然後轉送窮人、他又為失業者介紹工作，襄助貧苦兒童入學等等。¹¹

薄扶林村至今約有二百年歷史，特別在往昔的時候，村民的內聚力很強，這或許是源於他們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信仰、每年共同參與宗教節日儀式等等所使然。這無疑會構成一股抵抗天主教信仰與文化的張力。然而，教會要加強自己在傳道上的拉力則需要借助其他的渠道。針對薄扶林村，明神父主要透過教育及醫療兩大慈善服務去接觸村民。

在教育方面，隨著員工相繼在太古樓定居繁衍，員工子女對教育的需求日漸加增，於是巴黎外方傳教會在1951年興建了聖華學校，主要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的修女負責教導，讓幼童可以接受小學教育。聖華學校初建時主要教導太古樓的幼童。¹²然而，明神父卻認為教育是一連繫教徒與非教徒的橋樑，於是對外開放學校。1953年，聖華學校約有一半學生來自非天主教家庭，其中不乏來自薄扶林村。¹³聖華學校分為上、下午校，課程主要有中文、英文、算術、社會以及聖經德育課等等。聖華學校的老師，特別是修女對居住在太古樓的學生特別嚴格，除了規定他們於每星期日參加歌詠團或者宗教要理之外，還會要求操行太差的學生短暫停課，留在家中自修。薄扶林村的幼童就是透過接受教育從而認識天主教以及巴黎外方傳教會。

在醫療方面，明神父在成為主任司鐸後，有意在薄扶林村興建一間診療所，希望能夠透過診療所去服務區內以致薄扶林村的村民。¹⁴診療所建於



明神父在薄扶林村興建的診所

1953 - 54年間，在此之前薄扶林村的居民需要接受簡單的治療時，大多會到太古樓診療所尋求幫助，¹⁵明神父認為醫療服務能有效打破兩處居民的隔膜，因而才計劃在薄扶林村內興建診療所。村診所收費從廉，一星期要診治的病人多達2000。¹⁶而村民往往在求醫的過程中對教會有更多的了解。

從以上可見，教育以及醫療服務增加教會與薄扶林村居民接觸的機會。從口述歷史的訪談所得，明神父在村內仍有其他的福利工作，例如探訪病人、照顧孤兒、安撫鰥寡等等，這些善工都可以幫助協助教會與村民建立關係。

四、集體回憶與保育——從太古樓到醫療站

筆者過去進行了一系列與太古樓有關的歷史重構研究，明白到保存集體回憶與保育建築物之間的難處。保存居民對太古樓的集體回憶的困難在於太古樓整個建築群已經被清拆掉，現在不能直接透過昔日的建築物來勾起居民的回憶；即使居民、舊照片仍然存在，然而沒有建築物，集體回憶仍不能具體地呈現於居民以及大眾眼前。

可是，當我們希望要保留任何一幢建築物時，我們都需要認真考慮保留它的代價。教區拆卸太古樓是因為教區希望將整塊地皮賣給發展商，¹⁷而這決定是為了籌集更多資金供應不同堂區的需要。教區有見當時有不少的太古樓居民以及教眾都已獲安置入住華富邨，因而減少其賣地的憂慮。¹⁸再者，當納匝肋印書館關閉後，原來繫著整個群體中心的網絡已經受到破壞，¹⁹有不少的員工在其他地方很快地找到新的工作，太古樓因而未必再是他們理想的居住地。因此，考慮教區經濟上的難處以及居民實際上的需要，若要保留太古樓，在當時是相當困難的。

薄扶林村內的醫療站最近面臨清拆的危機，它的去留，相信需要社會各方盡量權衡彼此間的利益。雖然醫療站已經廢棄，然而文化保育者正是有責任

從被廢棄的歷史遺物中找出其歷史保育的價值。醫療站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曾經是連繫太古樓與薄扶林村的橋樑，是建立不同社區間和諧共處的象徵。一方面兩處的居民可以彼此接觸；另一方面，薄扶林村的居民透過醫療站提供的服務去認識神父、修女以及天主教信仰。醫療站雖然處於薄扶林村，但卻同時承載著與薄扶林村及太古樓有關的歷史片段。它亦見證了香港在廿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醫療情況。若然正視醫療站為薄扶林村的歷史的一部分，保存醫療站其實已經是對薄扶林村作出保育，然而，整個薄扶林村的保育計劃仍然需要更多社會大眾的關注。

五、總結

在英國佔領香港島前，薄扶林區已是有人聚居的地方。區內的薄扶林村歷史悠久，村民以務農及漁業為生，因此位於這區的水源及瀑布是村民的生命線。港英時期先後在這區發展的太古洋行、林柏公司（Lapraik Company）、牛奶公司、置地公司等建立了香港的航運業、畜牧業及房地產。為配合港島的發展，在這區設立的第一個水塘更使這區的歷史與香港的發展史融而為一。天主教傳教士的參與卻在這區加入了印刷業和西方宗教的社群，令這原是偏僻的村落成為多采多姿的社群。

香港社會在世紀交替間，極力發展金融、旅遊等服務行業，而房地產一枝獨秀，壓倒了在歷史上多元發展的光彩。在這情況下，保存過去的遺跡，並非只有感性的懷舊價值，卻是一個保留地區社會生命力的憑證，新一代的人更可藉此獲得邁向將來的索引。

1. Bruno Lepeu, "The Asian Missionary Network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in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Vol. Two, Research Papers*, eds. Louis Ha and Patrick Taveirne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p. 93.
2. 資料詳參 Bruno Lepeu, "The Asian Missionary Network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p. 68, 71 - 73, 93.
3. 同上註，頁78 - 80。
4. 樂艾倫，《伯大尼與納匝肋，伯大尼與納匝肋：英國殖民地上的法國遺珍》（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頁76，79，86。
5. 同上註，頁79。
6. Bruno Lepeu, "The Asian Missionary Network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p. 80, 89.
7. 關於露德聖母堂的資料，可參考露德聖母堂堂區發展歷史網頁<<http://www.lourdes.org.hk/Parish%20History.htm#history1995>> 30/05/2012

- 
8. Bruno Lepeu, “The Asian Missionary Network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p. 93.
 9. 樂艾倫，《伯大尼與納匝肋，伯大尼與納匝肋：英國殖民地上的法國遺珍》，頁119。
 10. 同上註。
 11. 林雪碧，〈明之剛神父小傳〉，頁6 - 7。<http://taikoolau.com/linked/Bio_Rev_Chevalier.pdf> 30/05/2012
 12. 樂艾倫，《伯大尼與納匝肋，伯大尼與納匝肋：英國殖民地上的法國遺珍》，頁119。
 13. 同上註。
 14. 林雪碧，〈明之剛神父小傳〉，頁6。
 15. 樂艾倫，《伯大尼與納匝肋，伯大尼與納匝肋：英國殖民地上的法國遺珍》，頁120。
 16. 林雪碧，〈明之剛神父小傳〉，頁6。
 17. 樂艾倫，《伯大尼與納匝肋，伯大尼與納匝肋：英國殖民地上的法國遺珍》，頁126。
 18. 同上註，頁122。
 19. Bruno Lepeu, “The Asian Missionary Network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p. 93.

參考資料：

樂艾倫：《伯大尼與納匝肋，伯大尼與納匝肋：英國殖民地上的法國遺珍》。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Lepeu, Bruno. “The Asian Missionary Network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In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Vol. Two, Research Papers*, edited by Louis Ha and Patrick Taveirne, 76 - 126.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露德聖母堂堂區發展歷史網頁 <<http://www.lourdes.org.hk/Parish%20History.htm#history1995>>30/05/2012
林雪碧，〈明之剛神父小傳〉 <http://taikoolau.com/linked/Bio_Rev_Chevalier.pdf>30/05/2012

明之剛神父小傳

林雪碧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圖書館助理主任

20

一、生平

明之剛（René Marie Chevalier, MEP, 1909-1981）生於法國波普雷奧（Beaupréau, France）一個農民家庭。小學畢業之後，他便在家族的農莊中工作，培養出他堅毅踏實、刻苦耐勞的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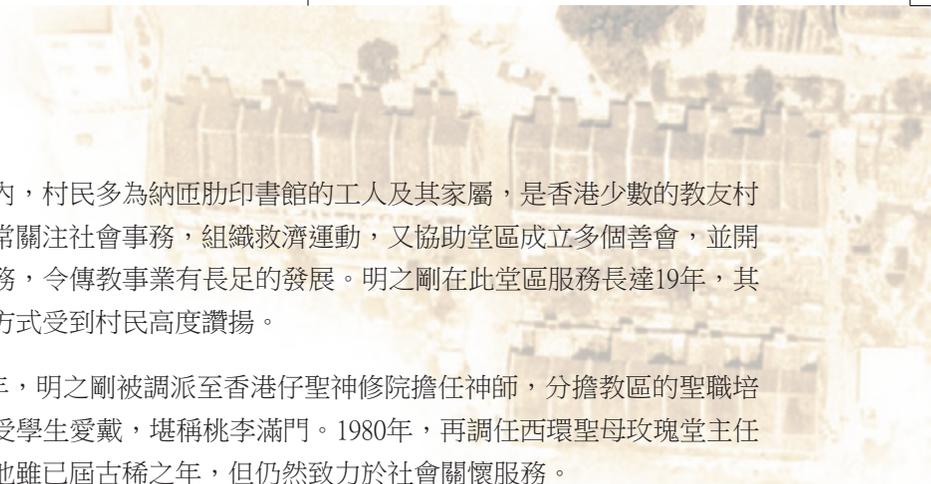
明之剛一面工作，一面思考自己的未來。他細心聆聽天主的聲音，後來，他肯定了自己的召叫，甚至明確地指出天主給他的是傳教聖召。於是，他到備修院學習，直至1935年，正式加入巴黎外方傳教會；在入會申請表上，他的推薦人給予他極高的評價：虔敬、勤奮、仔細、盡責、機智，具備了作為一個出色傳教士的一切條件。經過7年的訓練，他在1942年領受了司鐸聖職，並獲派遣到中國廣東傳教。可是，當時正值世界大戰，歐亞兩地均深陷戰火之中，令他無法起行，唯有留在家鄉，服務當地教眾。



大戰結束後，明之剛終於可以遠赴海外，履行他作為外方傳教士的使命。經過兩個多月的旅程，他在1946年8月踏上中國的土地，隨即開展工作，獲派駐廣州石室教堂和石龍痲瘋病院。

太平的日子維持不了多久，中國再次陷入戰火中；國共兩黨內戰，迅速波及全國。未幾，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國民黨退守台灣。在共產黨統治下，境內外國人的活動受到多方制肘。1951年，廣州教友在石室教堂召開代表會議，議決落實「三自愛國教會」運動。所謂三自，即自治、自養、自傳，意指教會需由中國教友自辦，脫離梵蒂岡的管轄。當時，大批外國傳教士被驅逐出境，明之剛亦未能倖免，終於在1952年被迫離開中國，前往香港。

抵達香港後，明之剛旋即被派到露德聖母堂服務。露德聖母堂位於薄扶



林太古樓村內，村民多為納匝肋印書館的工人及其家屬，是香港少數的教友村之一。他非常關注社會事務，組織救濟運動，又協助堂區成立多個善會，並開拓南丫島教務，令傳教事業有長足的發展。明之剛在此堂區服務長達19年，其為人處事之方式受到村民高度讚揚。

1971年，明之剛被調派至香港仔聖神修院擔任神師，分擔教區的聖職培育工作，甚受學生愛戴，堪稱桃李滿門。1980年，再調任西環聖母玫瑰堂主任司鐸，其時他雖已屆古稀之年，但仍然致力於社會關懷服務。

1981年4月，明之剛休假返回法國；途經泰國，本擬探訪當地難民，卻遇上車禍而逝世，終年72歲。遺體運返香港後，安葬於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他意外遇難，使整個香港教區為之震動，追思活動不絕；其殯葬禮即由香港教區主教胡振中主持，數十位神父共祭，教堂內坐滿吊唁人士，當中不乏曾受他恩惠的非教友，喪禮極備榮哀。教廷傳信部長羅西樞機（Agnelo Rossi, 1913-1995）亦致函巴黎外方傳教會總會，表達哀思。²眾口一辭，對他稱譽有嘉：「……明神父的肉體雖已不存在，但他的靈魂比肉身高貴萬倍，他已得到永生，他到達了人的目的地——天堂。」³

傳教士的首要任務必然是傳教，而當他遠赴異域時，少不得要有冒險犯難的犧牲精神；以下即以傳道和殉道兩方面縷述明之剛的傳教事業。

二、傳道

1. 尊重本地文化

過往很多西方人自視比有色人種更為優越，肩負起改造世界的使命，此即所謂「白人的重擔」（white man burden）。他們輕視其他文化傳統，企圖把自己的風俗習慣強加於人。部份早期來到中國的傳教士，眼見當時中國人落後無知，少不免亦帶點優越感，也不曾認真探究中國文化的特質，往往因此引起了不必要的矛盾衝突，窒礙信仰的傳播。

明之剛則明白到「為一切人，成為一切」的道理，他給人留下的印象，除了一把鬍子、一個煙斗之外，就是一襲中式的黑布長衫。那是當時中國人的日常衣飾；他從外表出發，讓人知道他雖然是法國人，實則與中國人無異，他願意把傳教地視為自己的家。

明之剛在家，當然要說家鄉話——粵語；事實上，學習粵語就是他在中國面對的第一個挑戰。粵語有九個聲調，聲調不同，意義也就不同，譬如「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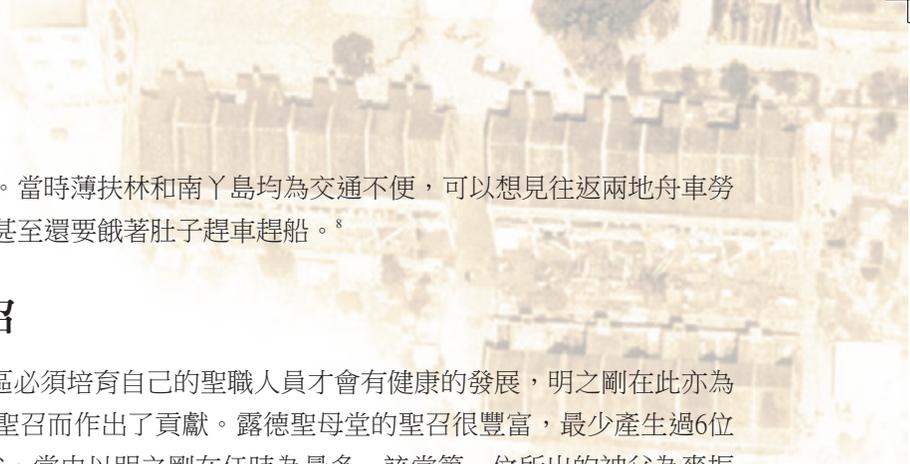
路」和「細佬」發音相近，意義卻差距甚遠。同時，粵語中夾雜很多俗語俚語，或者有音無字等困擾。這對他來說，實在異常複雜難學；太苦惱時，他會做些小手工以作調劑，然後又會大聲朗讀中文，繼續那艱澀的課程。他學成粵語之後，常會說：「呢D嘢，係咁架喇！」用以安慰他人；從中流露出他的心意，就是任何事，總有天主的安排，得失不必看得太重。他生性和善，面對他人惡行，鮮有疾言厲色，只會說：「我話你知，咁樣唔得架喇！」⁴

1954年5月23日為太古樓村兒童和平日，露德聖母堂舉行了一台中文彌撒，使村民、兒童更能投入禮儀。天主教一直使用拉丁文舉行彌撒，因此很多教友根本不明白彌撒經文的意義；直至60年代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教會才正式准許使用本地語言舉行彌撒。明之剛並非第一個提倡禮儀本地化的人，在此之前，本地化風潮已醞釀多時，同時教友又對傳統戀戀不捨；他能夠審時度勢，回應教友之所需，對本地化運動亦不無貢獻。⁵

2. 拓展教務

明之剛擔任過多個職務，當中以駐守露德聖母堂最為長久。露德聖母堂位處香港南面，早期往返市區之交通不便，所以自建立以來，教友數目一直不多，發展不大。50年代，大批大陸新移民湧入香港，人口激增，教友人數也相應增多，從當時的3萬多發展至70年代的20餘萬。明之剛配合了牧民所需，亦為應付大量新移民所造成的社會壓力，於是在堂區組織了多個團體，如聖母軍、聖雲先會等，舉辦了多項活動，使整個堂區也充滿活力和朝氣，露德聖母堂一躍而為薄扶林的傳道中心。每年慕道者人數總在百人以上，單在1957年領洗人數即有187人，但是隨著移民潮漸趨穩定，新增教友人數亦告回落，教友總數從1954年的數百人大幅倍升至1957年約1500人，然而直至1964年，亦只有大約1700人。⁶

教友人數增多外，露德聖母堂區的範圍也隨之擴大，包括全薄扶林、雞籠灣、鋼線灣、大口環及南丫島等地。1958年，明之剛前往南丫島傳道，他先拜訪多條村落的村長鄉紳，道明來意，彼此建立友好關係，日後若有信仰風俗問題而產生磨擦也能夠容易和平解決。當時全島只有一個廿多年未參加過彌撒的教友。明之剛先於大坪村租用民居以作聚會之所，招收慕道者；後來則買地創辦露德聖母學校，為當地兒童提供教育服務，亦使居民更能認識教會。明之剛由聖母軍成員、江門聖母聖心會修女等人陪同，幾過多年努力，1969年即有十餘人領洗入教；人數雖然不多，但從無到有，當中變化不可謂不大。⁷每週日，明之剛在露德聖母堂主持上午8時彌撒後，迅即驅車至中環搭乘小輪前往南丫島主持中午1時彌撒，直至黃昏5時，才返回露德聖母堂，又在晚上8時與



教友舉行晚禱。當時薄扶林和南丫島均為交通不便，可以想見往返兩地舟車勞頓之苦，有時甚至還要餓著肚子趕車趕船。⁸

3. 培育聖召

一個教區必須培育自己的聖職人員才會有健康的發展，明之剛在此亦為香港教區培育聖召而作出了貢獻。露德聖母堂的聖召很豐富，最少產生過6位修女和4位神父，當中以明之剛在任時為最多。該堂第一位所出的神父為麥振群，其年幼即矢志修道，後加入慈幼會，並在羅馬晉鐸。⁹聖召之豐富，皆因該堂教友多為納厘肋印書館的工人及其親屬，當中不少人有通婚的姻親關係、代父母的神親關係，彼此關係密切，而紅白二事均以天主教儀式進行，造就了濃厚的宗教氣氛。明之剛上任後，更積極推動宗教活動，組織多個善會小組，每晚必與教友一起進行晚禱，又常聚集在聖母山前誦唸玫瑰經，而每週大節慶更有退省祈禱，如1965年的堂區主保瞻禮期間，便舉行九日敬禮，同時安排教友避靜，務使教友時刻浸淫在神的氛圍中。¹⁰

1971年，教區調派明之剛擔任聖神修院神師，這對於露德聖母堂的教友而言，自然是個壞消息，尤其太古樓的村民，更是不情不願，甚至曾上書教區要求收回成命，只是挽留之議未獲批准。¹¹聖神修院為香港教區培育司鐸之重要基地，是「教區的心臟」。¹²是項任命讓明之剛直接參與聖召培育的工作。這個「心臟」顯然患有心臟病。當時，正值火紅年代，受到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社運、工運非常發達，社會上對權威之挑戰、要求改革之聲不絕；流波所及，教會亦不能免，教友要求教會更直接參與社會事務，神職人員要求教會更深入人群，有些更走到工廠當起工人來，或者質疑修院傳統培訓模式的實用性。另一方面，在梵二精神的推動下，教會在牧民、禮儀等各方面均有所革新；再加上華南總修院與教區修院兩者合併，又把神學課程開放予修女及平信徒修讀，如此，在人事或學制上必然會有重大的改變，當時修生留學羅馬、台灣或在本地進修，也曾爭論過好一陣子。在如此動蕩不安的境況下，明之剛接任神師一職，其中挑戰不言而喻。他負責整個修院的靈修訓練，修生每月與他單獨傾談最少一次，假若修生認為他並非自己理想的靈魂導師，可以另覓合適神師，但若有修生求教，他必會毫不吝嗇地給予幫助。他一直秉持梵二司鐸培育法令的要求：「靈修訓練當與教義及牧民訓練密切聯合，而尤其應於神師之指導協助下實施之，好能使修生學習藉著聖子耶穌基督，在聖神之內，與聖父親密的生活。」¹³他按著自己多年的牧民經驗，為修生提供了不少意見。此外，他年輕時務農，在修院內也經常打理草木，常自稱是修院的花王，至今仍可見其手澤；每週的清潔日，又必會率先動手清理園子，年輕修士看見他做得

汗流浹背，也自覺不能躲懶。他就是如此以身作則感染週遭的人。¹⁴縱觀他在任9年，並未聽聞修生同袍對他有任何劣評。

三、殉道

24

明之剛並非為維護信仰而受迫害致死的殉道者，但是他的完全奉獻、甘為他人而忘卻自己之犧牲精神，當可媲美殉道聖人；事實上，他在泰國也是為了探訪難民而遇上車禍，其服務他人與關懷弱小之心，可說是至死不渝。

1. 照顧痲瘋病人

明之剛抵達廣州不久，即奉派到石龍痲瘋病院照顧病人。石龍痲瘋病院成立於1907年，位於東江下游的兩個江心小島，分設男女病院。病人數目由成立之初的數十名，至高峰時多達四、五百。痲瘋病是一種高傳染性的疾病，可使病人容貌扭曲，肢殘體缺，極其可怕。因此，很多病人遭到親人遺棄，而其時政府也派有軍人荷槍實彈駐守各個要道，防止病人進入市集。可以想見，病人不但要承受肉體上的痛苦，其心靈之傷痛更是難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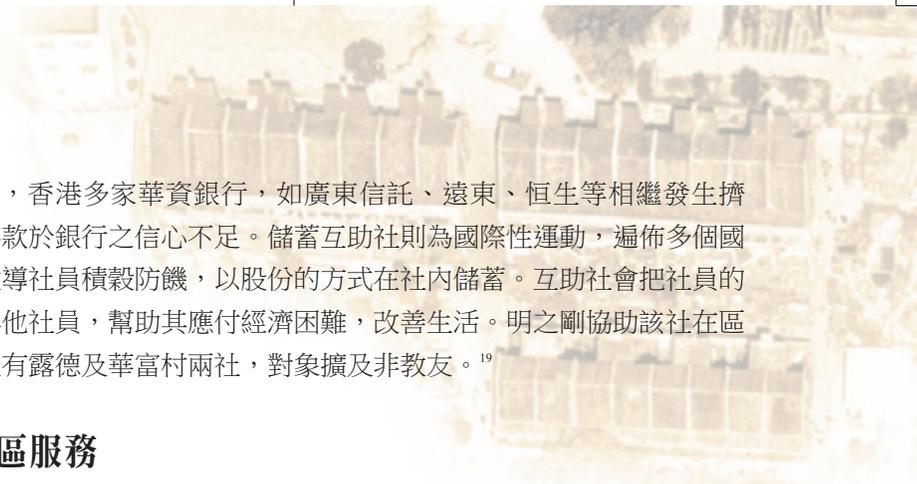
當時願意到病院工作的人並不多見，政府亦鮮有資助。在人力物力俱缺的情況下，經營實在不易。故此，在那裡工作的人，都必須親自處理瑣事雜務，無不感到工作繁重；自創院之始，多位負責人每因工作過勞或感染痲瘋而病死，如創辦人比利時籍的江神父，就因為染上痲瘋病致死。¹⁵1947年，明之剛接手管理病院，便似是抱有殉道的決心。他十分同情病人，親近他們，為他們洗腳換藥，不怕髒臭，不懼傳染。他不但照顧病人的身體，還醫治他們的心靈，讓他們在可怕的疾病中，仍然有尊嚴地過活。¹⁶

2. 組織堂區善會

明之剛為露德聖母堂籌辦了多個善會組織。早年香港社會福利不全，一般民眾生活艱苦，經濟出現問題時，往往求助無門。而他至為關心勞苦大眾，因此他所倡導的組織，多以援助大眾為宗旨。

1955年成立聖雲先會。該會為世界性組織，宗旨為幫助有困難的人士，不分宗教與國籍。該會給予的援助金額不多，但總能表達支持的心意。¹⁷

1958年成立聖若瑟會，旨在招收堂區教友守望相助。該會要求會員繳交會費，集腋成裘，用以幫助有急需之會員；遇有會員離世，其他會員每人須捐助1元給其家屬，作為殮葬之用，並緩解燃眉之急。¹⁸



60年代，香港多家華資銀行，如廣東信託、遠東、恒生等相繼發生擠提，市民對存款於銀行之信心不足。儲蓄互助社則為國際性運動，遍佈多個國家，目的是教導社員積穀防饑，以股份的方式在社內儲蓄。互助社會把社員的儲蓄貸款給其他社員，幫助其應付經濟困難，改善生活。明之剛協助該社在區內成立，先後有露德及華富村兩社，對象擴及非教友。¹⁹

3. 參與社區服務

明之剛所關心的對象，絕不限於教友，他關懷所有人。他在1952年中才抵達香港，未及一年即爭取興建診所，服務區內市民。後來他在薄扶林村購得一地，正要落實進行；但是，薄扶林村民以該地毗鄰靈塔廟，對神靈不敬，反對計劃，幾至釀成太古樓村與薄扶林村兩村村民武力對抗。後來，薄扶林村的一名嬰孩患了急病，被修女醫好，反對之聲才平靜下來，診所得以順利建成。診所收費從廉，一星期要診治的病人多達2000。可惜由於人手不足，其後診所停辦，原址改作圖書館之用。²⁰

此外，無論如何忙碌，明之剛每星期總有一、兩天走訪醫院探望病人，一如他對待癡瘋病人，要讓他們在病苦中得到一點安慰。他從不以此為苦，更視之為愉快的旅行。²¹他走進大口環兒童醫院，病童便會圍著他，要求他講故事，有的坐在他膝上，有的甚至爬到他背上去。當他探訪肺結核患者時，同行的人往往遠遠避開以免受到傳染，只剩他一人與患者聊天談笑。²²他對病弱者的關懷，絕對發自內心，也感動身邊不少人。當他離世後幾個月，聖母玫瑰堂成立「醫院探訪組」，繼續他的愛德工作。²³

面對經濟艱難的市民，最直接有效的就是贈送金錢物品；當時，香港多個慈善機構都會向窮人派發救濟品。明之剛向富裕人家募捐物資，然後轉送窮人。求助者眾多，他一視同仁，不分教內教外，均親自派發。遇有老弱行動不便者，則把救濟品送往其家中，務使人人不受飢寒煎熬。他又為失業者介紹工作，襄助貧苦兒童入學，儼似萬家生佛。²⁴

4. 和善克己

明之剛在香港主要服務過3個機構：露德聖母堂、聖神修院及聖母玫瑰堂。前文提過他在動蕩中擔任聖神修院神師一職。其實，他在接任兩堂主任司鐸之職時，兩堂亦發生過一些人事糾紛。1952年2月，太古樓村村民上書教區，狀告露德聖母堂時任主任司鐸與女教友發生曖昧關係，要求撤換；²⁵明之剛走馬上任後，卻得到村民教友的熱烈愛戴。1980年，他繼任聖母玫瑰堂主任

司鐸時，該堂區之善會、委員會等不下20個，各會積極為堂區服務，但卻經常只以自己為重，從而與其他小團體產生磨擦，整個堂區的氣氛並不和諧。他上任後旋即找出問題的癥結，對症下藥，提出「堂區一家親」的新路向，促使各會從各自為政走到以堂區為重的一面。²⁶明之剛在該堂服務不到一年而辭世，但該堂多年來沿用「堂區一家親」口號；例如2004年訂為堂區主保月主題，2005至2007年訂為堂區年度目標，明之剛之影響可謂深遠。

明之剛善於化解糾紛，並非由於他能言善道，除了是由於他天賦的親和力之外，更由於他身體力行為眾人所立下的榜樣，令人折服。首先，他對人親切友善，並不容易動怒，臉上總帶著一絲笑容，讓人如沐春風，也讓人看得見作為基督徒的平安喜樂。第二，他對人慷慨，自己在生活上卻儉樸無華；他會花錢購買新棉襖送贈學生，自己卻長年累月穿著同一件破舊長衫；²⁷他向窮人分送物資，自己吃的也不過是清水煮菜。²⁸第三，他勤勞用功，言行一致；除了經常探訪教友和病人之外，他更會動手處理人所厭惡的工作，例如清理小動物屍體、疏通淤塞渠道、修剪雜草、栽花種樹等。此外，他自己雖然工作繁重，但從不說「忙」；也教導後輩，作為神父必須要有一顆「得閒」的心，隨時準備接待他人、了解他人的需要。²⁹

四、結語

明之剛沒有做過扭轉乾坤、驚天動地的大事情；他只是一步一腳印的做好份內事，更不怕麻煩，不怕艱難地做好有益於人的份外事；以致逝世超過30年，但仍然讓人感念至深。縱觀其鐸職生涯，或可得出幾個重點：一，真正的牧者；他為人並不多言，不會向人講論長篇道理，他不是佈道家；他沒有留下文章著述，不會向人介紹深奧的神學教義，他不是神學家；然而，他與人分享的都是自己的生活體驗，絕不空泛虛浮；而且他能體察別人的需要而予以幫助。二，照顧弱小；他竭力救助窮人，扶助被社會被親人遺棄的一群，讓他們在身體和心靈上都得到安慰。三，寬仁克己；他待人以寬，但律己以嚴，把一切最好的都獻給有需要的人。四，全然信靠天主；作為基督徒，作為神父，他生活的核心就是信仰；堅定的信仰令他著實效法耶穌愛人的情懷，讓他無懼險阻，坦然面對困難，而且，也是他喜樂之源泉。

世上無完人，相信明之剛也有著人性的弱點，可是在現存資料中，卻無從得見；無論在他生前死後，他的堂區教友、學生或同袍對他的評價都是正面的。或許，在他待人以誠、無私奉獻的巨人身影中，他性格上的缺點或行為上的偏差都變得毫不顯眼。事實上，他生前即享有「大聖人」之美名，足見他的

思想、言論、行為均得到他人的充分肯定，而每當聽到此一稱呼時，他總會謙遜敬謝。³⁰今且以一「王」字總結其一生：頭頂青天，腳踏實地，居中者則與人為善，天下所歸往也。

1. “Le Pere Rene Chevalier”, Voir carte, nos 4 et 5, pp. 40.
2. 同上，頁51。
3. 鄧美月：〈我們的校董：明之剛神父〉，《公教報》，1981年6月5日。
4. 劉尚遜：〈老牧者不死〉，《公教報》，1981年5月8日。
5. 蔣耀東編譯，張慧珠譯：〈露德聖母堂的歷史〉，《露德聖母堂：新堂落成祝聖紀念》（香港：露德聖母堂，1983），〔頁4〕。
6. “Ratio Spiritualis”, obtained from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 Section I Box 7 Folder 5.
7. 達彌爾：〈明之剛神父與南丫島的歷史〉，《公教報》，1976年2月13日。
8. 屈鏞：〈舊憶瑣記〉，《露德聖母堂：新堂落成祝聖紀念》，〔頁21〕。
9. 〈百年來聖召初葉，露德堂大事慶祝，麥振群神父晉鐸回港〉，《公教報》，1968年8月30日。
10. 陳志明口述訪問，2011年9月；另見〈露德聖母堂區，十四日慶主保〉，《公教報》，1965年2月12日。
11. 屈鏞：〈舊憶瑣記〉，《露德聖母堂：新堂落成祝聖紀念》，〔頁22〕。
12.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司鐸之培養法令》（台北：鐸聲月刊，1966），頁6。
13. 同上，頁7。
14. 藍：〈師〉，《公教報》，1981年5月15日。又見關傑棠：〈牧者：悼念明之剛神父逝世一週年〉，《公教報》，1982年4月23日。
15. 東莞石龍鎮人民政府編：《石龍鎮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4），頁599-601。
16. 劉尚遜：〈老牧者不死〉。
17. 〈聖雲先會〉，《露德聖母堂：新堂落成祝聖紀念》，〔頁29〕。
18. 〈聖若瑟會〉，《露德聖母堂：新堂落成祝聖紀念》，〔頁32-33〕。
19. 〈華富村儲蓄互助社〉，《露德聖母堂：新堂落成祝聖紀念》，〔頁28〕。另見《公教報》，1968年3月15日。
20. 蔣耀東編譯，張慧珠譯：〈露德聖母堂的歷史〉，《露德聖母堂：新堂落成祝聖紀念》，〔頁4〕。
21. 傅兒：〈爺孫情懷篇〉，《公教報》，2001年4月22日。
22. 劉美寶：〈我的本堂神父〉，《公教報》1965年7月30日。
23. 〈西環聖母玫瑰堂的愛德服務〉，《公教報》1981年9月1日。
24. 屈鏞：〈舊憶瑣記〉，《露德聖母堂：新堂落成祝聖紀念》，〔頁21〕。
25. Letter to the Bishop, 1952.2.25, obtained from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 Section IV Box 7 Folder 2.
26. 姚崇傑：〈牧職團的話〉，《西環聖母玫瑰堂卅週年紀念特刊》（香港：聖母玫瑰堂，1983），頁7；另見羅國輝：〈初戀〉，《聖母玫瑰堂建堂金禧》（香港：聖母玫瑰堂，2003），頁49。
27. 周景勳：〈今之聖〉（未刊稿）。
28. 宛瑕：〈我們的明神父〉，《公教報》，1981年5月22日。
29. 姚崇傑：〈給明神父的信〉，《公教報》，1982年4月23日。
30. 劉美寶：〈我的本堂神父〉。

一個社區工作者眼中的明之剛神父

冼昭行

明愛薄扶林社區發展計劃團隊主任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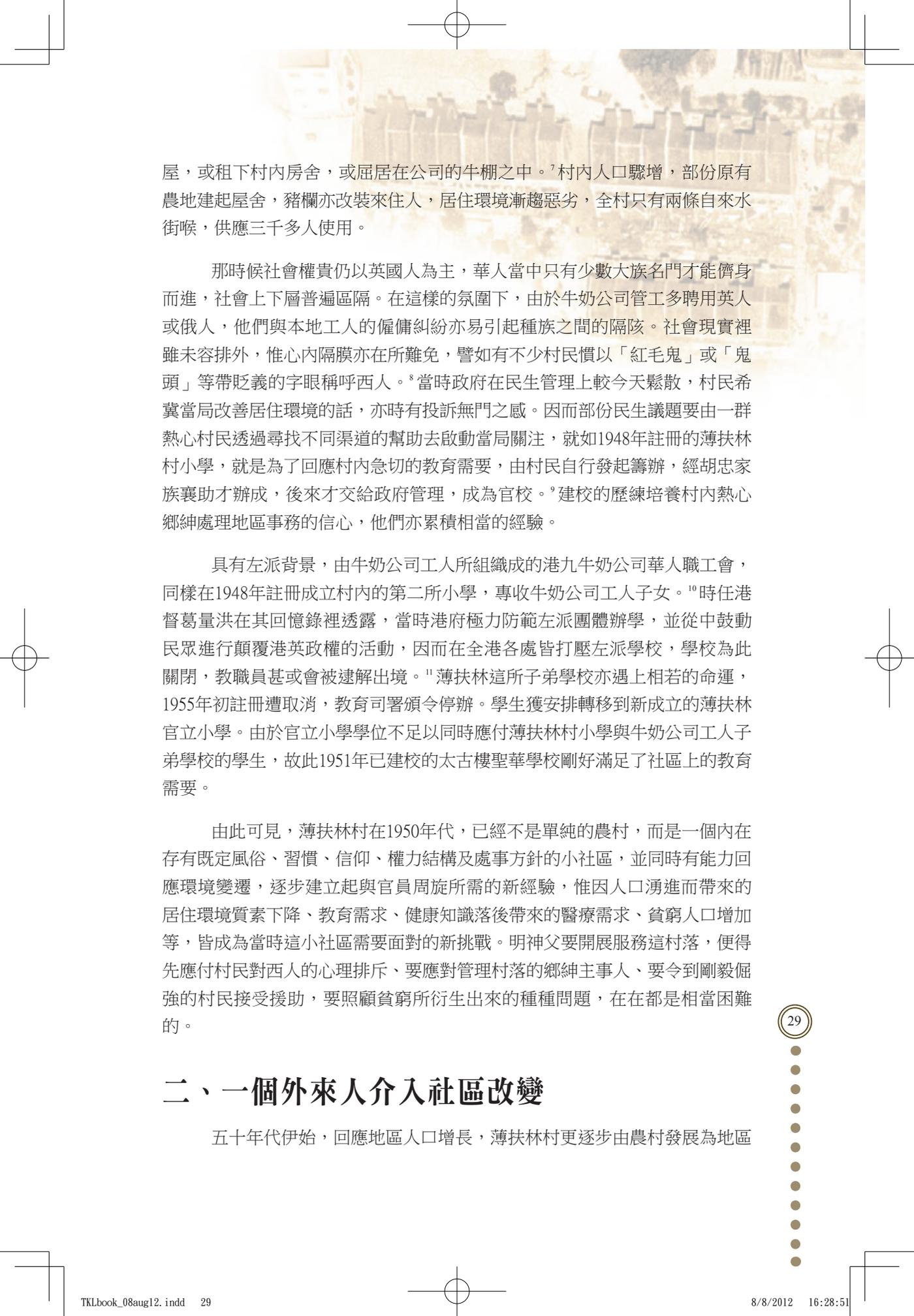
過去一年，明愛團隊在薄扶林村搜集村民的口述歷史，嘗試掌握這個港島上獨特的歷史聚落的過去。工作過程中，不時聽到村民憶述與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明之剛神父的相處經歷。明神父1952年從內地退回香港，旋即獲白英奇主教委任為薄扶林露德聖母堂主任司鐸。他任內推動堂區擴展慈善服務，及至包括薄扶林村在內的周邊社區，向區內社會下層平民提供教育、醫療、救濟及諮詢等服務。本文嘗試為明神父留下一個印記，記載上世紀五十年代一個從法國遠道而來的傳教士，是如何心懷社會關懷、開創性與決斷心，在海島一隅一個非天主教社區內開拓一番慈善事業。

一、明神父面對的時代背景

1941年12月24日，香港抵禦日軍南下的防線已全面崩潰，時任港督楊慕琦被迫投降，香港歷經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據時期。這段時間香港遭受戰火洗禮，人命傷亡無數，城市建設遭嚴重破壞。單以薄扶林一區為例，日軍侵襲就曾進行連串轟炸，相信是為了消弭英軍的防守力量與確保掌握港島西部航線通道咽喉的博寮海峽，不少薄扶林村居民被炸死或慘遭掃射。¹伯大尼及納匝肋修院的法籍神職人員被驅逐，²兩幢建築物被日軍據為高級軍官住所，以收盟軍不炸聖所之效。³日軍亦有進入薄扶林村及太古樓等聚落搜刮家禽、豬隻、日用物資，致令人人惶恐不安。戰事後期，美軍戰機反擊，亦沿薄扶林道投放炸彈，薄扶林村再次受到波及。就近的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寓所The Lamma View亦遭炮彈擊中，戰後擔任牧場經理的積臣（Peter Cyril Jackson）差點被炸死。⁴

當時薄扶林村不少村民避燹回鄉，惟原居民以此為家，在這裡渡過整個淪陷時期。日軍進行白米配給，每人每日只配給六兩四，白米之外糧食供應短缺，不少村民因而要捱餓，能夠以苦力賺到一家日日有米飯食已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⁵曾有一單親婦人更要走到牛房撿拾溝渠裡沾了牛糞的米糠碎粒回家洗淨來吃。⁶

1945年8月，日軍投降，香港重光。原有英國管理層重新接管牛奶公司，並聘用大量工人，包括不少從內地回港的勞動力。地區人口隨此而增加，惟牛奶公司卻只提供少數單層平房宿舍，故此不少工人在薄扶林村後山搭建木



屋，或租下村內房舍，或屈居在公司的牛棚之中。⁷村內人口驟增，部份原有農地建起屋舍，豬欄亦改裝來住人，居住環境漸趨惡劣，全村只有兩條自來水街喉，供應三千多人使用。

那時候社會權貴仍以英國人為主，華人當中只有少數大族名門才能儕身而進，社會上下層普遍區隔。在這樣的氛圍下，由於牛奶公司管工多聘用英人或俄人，他們與本地工人的僱傭糾紛亦易引起種族之間的隔阂。社會現實裡雖未容排外，惟心內隔膜亦在所難免，譬如有不少村民慣以「紅毛鬼」或「鬼頭」等帶貶義的字眼稱呼西人。⁸當時政府在民生管理上較今天鬆散，村民希冀當局改善居住環境的話，亦時有投訴無門之感。因而部份民生議題要由一群熱心村民透過尋找不同渠道的幫助去啟動當局關注，就如1948年註冊的薄扶林村小學，就是為了回應村內急切的教育需要，由村民自行發起籌辦，經胡忠家族襄助才辦成，後來才交給政府管理，成為官校。⁹建校的歷練培養村內熱心鄉紳處理地區事務的信心，他們亦累積相當的經驗。

具有左派背景，由牛奶公司工人所組織成的港九牛奶公司華人職工會，同樣在1948年註冊成立村內的第二所小學，專收牛奶公司工人子女。¹⁰時任港督葛量洪在其回憶錄裡透露，當時港府極力防範左派團體辦學，並從中鼓動民眾進行顛覆港英政權的活動，因而在全港各處皆打壓左派學校，學校為此關閉，教職員甚或會被逮解出境。¹¹薄扶林這所子弟學校亦遇上相若的命運，1955年初註冊遭取消，教育司署頒令停辦。學生獲安排轉移到新成立的薄扶林官立小學。由於官立小學學位不足以同時應付薄扶林村小學與牛奶公司工人子弟學校的學生，故此1951年已建校的太古樓聖華學校剛好滿足了社區上的教育需要。

由此可見，薄扶林村在1950年代，已經不是單純的農村，而是一個內在存有既定風俗、習慣、信仰、權力結構及處事方針的小社區，並同時有能力回應環境變遷，逐步建立起與官員周旋所需的新經驗，惟因人口湧進而帶來的居住環境質素下降、教育需求、健康知識落後帶來的醫療需求、貧窮人口增加等，皆成為當時這小社區需要面對的新挑戰。明神父要開展服務這村落，便得先應付村民對西人的心理排斥、要應對管理村落的鄉紳主事人、要令到剛毅倔強的村民接受援助，要照顧貧窮所衍生出來的種種問題，在在都是相當困難的。

二、一個外來人介入社區改變

五十年代伊始，回應地區人口增長，薄扶林村更逐步由農村發展為地區

的商業樞紐，當中尤以歷史最悠久的大街為中心。從村口走到大街盡頭約一百公尺長，那時候已有六間糧油米舖、四家理髮店、士多、茶檔、涼茶舖、文具店、洋雜貨店、麻雀館等等，還未數算村口街市賣豬、雞、菜、魚等商販。每月三號及十八號，因著牛奶公司發工資的日子，村內大街兩旁店舖門前更會堆滿從別處進村擺賣的小販，令薄扶林村成為一個有規模的市墟。¹² 因此從鋼線灣、新地、草寮、大口環、太古樓等遠近華人社群亦會到村內檔口店舖光顧，成為地區內的一個人流焦點。相信這亦是為何明神父在到埗之初，便選擇先介入這個鄰近堂區的小社區，並在內推行慈善及傳教的工作。

村民都深刻記得，這個陌生的外來人每星期也有三數日走進村來，高大的他入鄉隨俗地穿起一襲黑長衫，面頰上蓄上一絡白鬚鬚，手持煙斗，面常帶笑，溫軟的手會執著孩子的小手，更重要的是，能說得一口廣東話。¹³ 一派和善的形象，很快便替明神父跟村民建立起信任基礎。他跟村民逐漸認識下來，並沒有急於宣揚福音，而是細心關顧村內居民的需要。他並沒有隨俗般套上村民的眼光去看這個居住環境，去把艱難都「習慣」下來，而是以一個外人的角度去觀察，去發掘出可改善的地方並促進居民改變。從政府檔案資料便見得到明神父支持村民向水務署爭取加裝街喉的信件。¹⁴

那個年代華人求職，尤其是向政府部門及大公司企業，是須要請薦人館代寫推薦信，或要有保薦人介紹。明神父作為一個通曉英文的西人傳教士，他替不少村民寫過這樣的推薦信，讓他們能夠找到不錯的工作。¹⁵ 另一方面，他上任後在堂區成立多個善會，與教友合力去服務區內貧困戶。村民記得每週可領取食物的救濟，每個家庭可獲發麵粉、牛油、芝士等食糧，更有家庭為此選擇送子女到聖華小學就讀。¹⁶

明神父到任後決定開放剛落成不久的聖華小學及其幼稚園予來自非天主教家庭的兒童，讓他們能夠獲得便宜而又有質素的教育。與官立學校兩者相比較，不少薄扶林村民會認同法國修女的嚴厲治學風格，而交子女上去入學。這一措施，亦廣泛地令到薄扶林村人認識天主教會的工作。親和的形象，加上一連串的實質工作，令不少薄扶林村民對明神父油然而敬。

而象徵意義更大的就是在薄扶林村內建起太古樓診療所。1953年初，明神父已伙同婦女教友在村內空地為村民進行簡單診療的工作，同年五月他致信白英奇主教，求主教首肯向地政當局申請取用薄扶林村內一幅官地。¹⁷ 這幅官地座落村口位置，毗鄰村內其中一個重要神壇——伯公壇。

客家人對土地神相當敬重，視之為家中長者，故尊稱伯公。每條客家村落必會在其村頭村尾各置一個伯公壇保佑上下平安，亦有標示地界之用。所以

村頭的伯公壇是其中一個風俗與信仰上的重要地標。在其旁邊建起天主教建築物，或會引起傳統觀念固牢的村民不滿。為此，明神父、修女與堂區善人先在這裡積極地贈醫施藥，救助傷患，更親自驅車運送重病者到瑪麗醫院，逐漸讓不滿的聲音靜下來。在這個基礎之上，明神父在其往後近二十年的日子裡，都一直獲得村民的接受與敬重。後來每到禮拜日他也會到診療站內主持彌撒，信徒擠滿了兩層高的小樓。¹⁸

明神父在薄扶林村的慈善工作，事先並沒有清晰的大規劃，也沒有定下指標要完成多少功績，可他維持定期進村探訪，從村民口中探知社區上的各項需要，並階段性地，一件一件的推行計劃，為薄扶林村帶來實際的改變。村民追隨他處理事務，從他身上學習這個外來人的處事模式，而在日後自行促進生活的改善。這樣的能力與信心培養，為薄扶林村累積力量，有利日後整體發展。薄扶林村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進入了她的黃金時期，商業蓬勃，社區活力匯聚，居民組織逐一成立，村民的獨立性格與開創性，相信受明之剛神父影響者亦不少。

1. [日軍殺害薄扶林村民] 村民甘秀卿於2012年5月12日訪問中提供。
2. [神職人員被驅逐] 參考：Le Pichon, Alain. 2006. Bethanie & Nazareth: French secrets from a British colony. Hong Kong: HKAPA. p. 128.
3. [修院被據為軍官宿舍] 村民歐陽煥於2012年6月8日訪問中提供。
4. [不幸積臣] 該次轟炸後積臣給喚作「不幸積臣」。參考：The Dairy Farm Company. 1986. The Milky Way: The History of Dairy Farm. Hong Kong. p.131.
5. [日日有飯食] 村民黃彩娣於2012年3月14日訪問中提供。
6. [牛房拾米] 村民鄭惠英於2012年5月29日訪問中提供。
7. [當年牛奶公司工人生活狀況] 參閱1950年2月10、11、14及21日的南華早報專訪。
8. [「紅毛鬼」與「鬼頭」] 村民吳江乾與魏國雄分別於2011年9月16日及2011年8月5日訪問中提供。
9. [成立薄扶林村小學] 村民高貴福與魏國雄於2012年7月3日及2011年8月5日訪問中提供。
10. [牛奶工會成立子弟學校] 參考港九牛奶公司華人職工會成立四十週年會刊。
11. [防範左派學校] 記載於葛量洪回憶錄，參考：Grantham, Alexander W. 1965.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KU Press. p. 115.
12. [薄扶林大街的興旺] 村民盧旺興於2012年5月10日訪問中提供。
13. [明神父和善形象] 村民關惠嫻於2011年12月31日訪問中提供。
14. [爭取加裝街喉] 1955年6月27日明神父去信水務署陳述村內3-4千名貧窮村民活在缺乏食水的環境，希望當局加建街喉及減收按金外的附加費用。詳見政府檔案庫檔案編號：HKRS 287-1-814第109號文件。
15. [代寫保薦信] 村民高貴福於2012年7月3日訪問中提供。
16. [派發救濟品] 村民吳江乾於2011年9月16日訪問中提供。
17. [向主教提出申請使用官地] 香港教區檔案處藏一封日期為1953年5月28日由明之剛神父致白英奇主教的信函。
18. [診療站舉行彌撒] 村民魏國雄於2011年8月5日訪問中提供。

「內外縱橫太古樓」圓桌會議 主題文章回應

林杰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通識教育碩士及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32

今天有機會在此回應之前各位講者精采的報告及與各位師友交流，實在深感榮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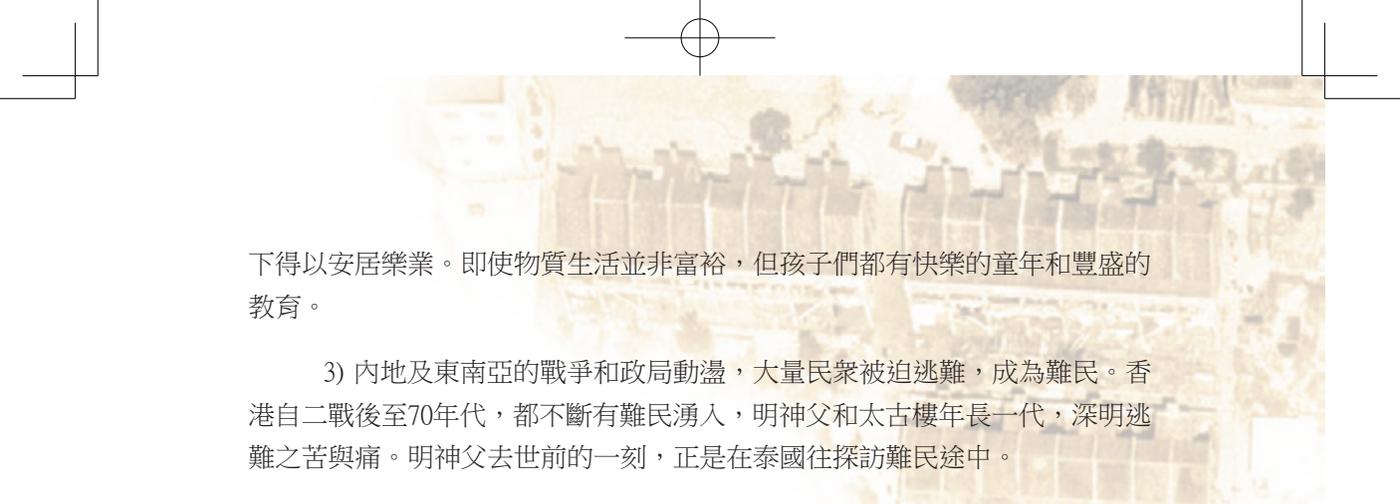
丁新豹教授生動地把太古樓放回香港十九至廿世紀歷史及香港整個城市的環境及發展，生動巧妙地把太古樓結合了薄扶林區在香港的歷史、地理、飲食、商業及宗教發展。牛奶公司、太古樓和巴黎外方傳道會的互動關係，緣起薄扶林區的地理環境及大家工作上的共同難題，並非傳統的宗教信仰，亦非純為利潤的商業合作，為時數十年，尤為生動寫實。這尤其反映昔日香港社會較為包容、敦厚的民風，不同社群同舟共濟的一面。

丁教授注意到1953年巴黎外方傳道會淡出香港，印書館結業。1954年尾，香港大學向巴黎外方傳道會購入納匝肋修院，改作大學堂宿舍。我特別想在兩件事之間插入1954年3月至5月，法國在越南奠邊府戰役戰敗，其背景是自1946年起一直時續的法越戰爭。奠邊府戰役是其中決定一役，法國戰敗後開始退出越南，之後再退出柬埔寨和寮國。印支半島這一連串戰爭和政局動盪，自1946年持續至1975年。而自1885年至二次大戰前，巴黎外方傳道會一直以香港作為支援整個中國和東南亞工作的印刷及後勤基地，這亦正是太古樓的起緣。置身1946至1950年代的政治局勢，巴黎外方傳道會以至所有天主教團體都不再可能在印支半島和中國內地工作。相信亦因此巴黎外方傳道會才在1953及1954年先後決定淡出香港和賣出納匝肋修院。

這段背景對明神父和太古樓有幾點深遠影響：

1) 明神父並未有隨巴黎外方傳道會離港，一直留在香港服務和工作。回想上述50及60年代的地區局勢，應會對明神父構成極為沉重的心理壓力。但他依舊長年熱心工作助人，以平常心過簡樸生活，實在反映其宗教信仰及個人修養的深厚。

2) 太古樓當時的成年居民，相信同樣感受到期間政局的動盪不安。透過明神父和他們的努力，大大減少了在生活和精神上的不安和擔憂，令太古樓上



下得以安居樂業。即使物質生活並非富裕，但孩子們都有快樂的童年和豐盛的教育。

3) 內地及東南亞的戰爭和政局動盪，大量民衆被迫逃難，成為難民。香港自二戰後至70年代，都不斷有難民湧入，明神父和太古樓年長一代，深明逃難之苦與痛。明神父去世前的一刻，正是在泰國往探訪難民途中。

夏其龍神父及溫國珩先生回顧1875至1954年，點出巴黎外方傳道會在整個薄扶林區的運作及建築物，俱是以香港作為亞洲地區的總支援中心，而非為在薄扶林區傳教。但後來明神父主動開放太古樓的小學及建立診療所，大大促進了古樓和整個薄扶林社區的關係。正是這種廣闊的胸襟與同舟共濟的精神，即使太古樓建築群消失了幾十年，今天依舊常存在太古樓及薄扶林村居民心中。夏神父及溫先生提醒我們，這種種宗教精神、社區生活、守望相助融合在一起精神和文化，既是我們現今社會和生活所缺乏及忽視，亦是近年探討歷史和文化建築保育時只關注建築物或硬件背後的一個盲點。

林雪碧博士關鍵地指出明神父是一位實幹家（a man of action），一生身教為先，多做事，快做事，做事好和做好事。林博士特別留意明神父1946至1952年初到中國，先到廣州石室教堂及石龍癲瘋病院服務。癲瘋病是昔日人人聞之色變的傳染病，醫學界直至1970年代方研究到有效的治療方法。可見神父是抱有殉道的心理準備到癲瘋病院工作，其中工作的艱辛和需要承擔的生命危險及精神壓力，實在遠超我們在2012年今天所能想像。林博士亦提到明神父喜歡種植，自稱花王，尤好種果樹。今天聖神修院仍見明神父種下的果樹。明神父樹木樹人，確是切合古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冼昭行先生以在明愛社區發展隊前線多年服務薄扶林村的經驗出發，回顧明之剛神父及太古樓上上下下，自1952年起拼手抵足建設發展太古樓，進而幫助薄扶林村，建立一個安居樂業，相處融洽的社區。冼先生首要指出五十年代的薄扶林區以至整個香港，政府當時基本上不理會亦不會幫助社會基層生活的困難。然則大眾在衣食住行及謀生各方面都面對莫大困難。住屋方面困難尤大，其時港島沿海自摩星嶺至柴灣，唐樓、木屋等建得密密麻麻，居住環境惡劣。衆多家庭只求「有瓦遮頭」，居住擠擁程度驚人。生計方面，冼先生所展示的米票，扼要反映基層大眾仍然擔憂日常基本糧食。簡簡單單一家老幼吃飽米飯已不容易。人浮於事，就業更是困難。其時一般求職都需要有信譽的商舖或個人作為保證，所謂「鋪保」。明神父常為薄扶林村村民寫推薦信，大大協助村民求職。

太古樓社區當時得天獨厚，同時為居民提供工作及宿舍，解決了謀生及

居住兩大難題。接下來太古樓居民便需要面對醫療及子女教育兩大難題。明神父1952到任，翌年即成立診療站服務整個地區，之後成立聖華小學，同樣開放給整個地區的學童，並不限太古樓區民。綜合冼昭行先生、陳忠明先生及謝麗蓮女士的報告，在今天來看，明神父除了肩負神職人員的工作，更主動負起現代社會工作的三大專業範圍：個案工作、羣體工作及社區工作，同時還是出色的區議員和老師，殊不容易。

34

夏其龍神父總結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太古樓及薄扶林區歷史發展」研究計劃的一連串活動，証實即使太古樓建築群在1970年代已被拆御，但太古樓建築群與社區真正的精粹，是非物質的宗教信仰、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情感及經年累月日常生活的一點一滴。隨着時間過去，這些精神與記憶慢慢結合，承存至今，並依然充滿生命力。保育太古樓的精神和文化不單可行，而且對香港的現在和將來饒有意義，是我們極之寶貴的文化和歷史傳承。這一點着實是整個「太古樓及薄扶林區歷史發展」計劃至為寶貴的收穫。





太古樓之友

雜憶

有太古樓人說故事—三篇由天主教研究中心製作的專訪；也有太古樓人寫太古樓事—十餘篇文章全部由太古樓居民親自撰文及訪問。另有太古樓人及其他教友探訪明之剛神父家鄉的朝聖旅程記錄。

陳忠明：「同」樂「童」趣太古樓

撰文：潘樂敏

36

四十年代出生的陳忠明從小居住於太古樓教友村，直到七十年代才正式離開。憶述童年，陳先生的眼光彷彿將幕幕舊事呈現眼前，帶我們進入他昔日快樂的時空。

墾荒太古樓

陳先生的祖先及長輩原本居住在西貢鹽田梓村，直到爺爺的一代才搬到太古樓。當時大部份居住在鹽田梓村的村民都已領洗入教，後來因為那裡的神父和太古樓的神父之間有所聯繫，知道納匝肋印書館需要工人做印刷，於是安排村民遷移到太古樓。

「我們上一輩有幾戶村民，就在鹽田梓村那裡搬了出來『搵食』。」

當時大約有五舍人搬了過來太古樓，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教友身份。因為鹽田梓村在那個年代多以務農、曬鹽為主，因此，來到太古樓作『新客』後，除了在納匝肋印書館工作外，他們的家人亦嘗試務農維生。

「他們就在太古樓居所門前或附近的山邊自己開墾一些耕地，我們家裡那時也有一幅耕地就在附近的山坡，後來建築了聖神修院的地方。」

陳先生的父親當時曾在修會工作，後來轉職做的士司機。

「太古樓是納匝肋印書館的員工宿舍，雖然印書館結束，但教會還繼續讓我們居住。我們都有疑問，有些住戶的家人好像未曾在印書館工作，為什麼會在太古樓居住，這可能是幫教會內的其他機構做事的吧。」

勤有功、戲無益？

太古樓的孩童都在聖華小學讀書，佔學生人數的一半。陳先生記憶中，聖華小學是當時一間名氣相當不俗的學校。

「學校的學生除了太古樓的孩童外，有一半來自薄扶林村，草寮村，鋼線灣村，水菜田（即現時的華富邨），又或者是大口環，就走到來這裡。男女學生比例相若。」



學校為了讓更多學生入學，會分為上下午班，課程大致包括中、英、數、社會、天主教德育、聖經等等。

「只不過如果是教友呢，修女就很嚴格……好像逢星期日要回去上關於宗教課。修女是法國的修會派來香港服務的，她們除了管理學校之外，並會負責教堂的詩歌班、及協助堂區神父組織宗教活動。」

聖華小學是中文小學，然而，相比薄扶林官立小學或其他學校在五或六年級才有英文課，聖華小學在三年級課程已經教授英語，即使收生更為嚴格，亦能吸引教友和非教友的家長送孩子來讀書。

當時有部份學生會對天主教產生興趣，繼而信奉天主教，因此，在聖堂參與彌撒時，往往不止是太古樓的居民，還包括附近薄扶林村的居民。

太古樓附近除了薄扶林村之外，周邊由牛奶公司的牧牛場及洋草山所包圍，還有牧牛場內的員工宿舍——草寮村及他們稱作「廿四間」的員工宿舍。「廿四間」是因為宿舍內有廿四個房舍而得名。

對於太古樓的小朋友來說，朋友是否同一個宗教、就讀同一間學校、居住同一社區等都不計較。非教友不會參加太多宗教活動，不過這亦無損他們之間的感情。

「我和非教友的同學還是很熟絡，平日都會一起玩，有時去薄扶林村，有時在太古樓，大家都會過對方和附近的地方，我們都是通山走的。」

其中玩得最多的地方是教堂門外的操場，他們叫「大地」的地方，其次是教堂側面的聖母山，聖母山是仿照法國露德的聖母岩而建造。因聖母曾經在露德那山洞顯現過，並傳達天主要世人悔改的信息。其後就在那山邊岩洞內安放聖母像，讓教徒在該處祈禱。

「大地還有有些草地呀、泥地呀，孩童時彈波子呢……我想這是太古樓之友集體回憶的地方。其次是冷巷，又是我們最多、最好玩的地方……除了彈波子之外，我們還會跳over，不用錢、不用甚麼，總之大家跳來跳去，另外就是過關遊戲。」

過關遊戲是他們自己發明的，會在地上畫好規範參加者追逐的線，畫線數目視乎參與人數而定，參加者要盡量躲避追逐者的追捕，越過一個又一個的關卡，過一關又過一關，相當有趣。巷的位置就剛好玩這些遊戲。這個遊戲在當時十分流行，男女都會一同參與。

此外，他們不時會到洋草山上玩，洋草山因此成為小朋友的樂土。洋草山上有很多蚱蜢，當時有不少人養雀鳥把玩，這就為太古樓的小朋友帶來了商機。

「有些居民會養雀，他們需要草蚱蜢時會給你一個籠，我們捉了草蚱蜢後會賣給他們。例如十隻多少錢、廿隻多少錢，我們就上山，洋草山最多這些草蚱蜢。這是第一個（賺錢）活動。另一個活動就是，有些住戶會養雞，飼料就是靠那些洋草。我們就會上山摘洋草。不過，這樣會跟那些牛奶公司員工（鶴佬人）有所衝突，因為他們種植那些洋草是給牧場的牛隻吃的，由於他們負責種植那些洋草。我們去摘就會觸動了他們的神經，就像破壞他們的東西，因此，他們會喝罵及追趕我們。」

「那時我們『通山走』，也少有病痛，我母親也不知從何學到那些叫『清明茶』或『咸茶』的良藥配方，就是在清明節的時候，去到伯大尼的山邊採摘心目中所需的植物，洗淨後及切碎，和鹽放入瓦罈內，約一年之後就可以服用。如果有甚麼身體不

適，就抓起一把，也沒有甚麼特別份量，只是抓起一把，然後用水煲滾幾分鐘，喝完後如果出身汗，感冒通常也會復原。因此普通的病都不會去看醫生，喝一劑「咸茶」，就會好起來。各家各戶也會向我母親拿取的，因為只有她懂得採摘，但後來已經失傳了。」

他們很多時都會往香港仔活動，例如踏單車、看電影等。假期也會到伯大尼山腳的海邊，即現時碧瑤灣的地方。

「我們叫『山底』，因為是山最底的地方，那裡就有個像泳灘的地方，我們會在那裡學游水、習泳，旁邊就是鋼線灣，我們往往會經過伯大尼的小徑落到下面。伯大尼那裡有個小墳場，主要是安葬去世的神職人員，附近也安葬了在香港淪陷期間去逝的太古樓教友。每年諸聖節，那裡也會有宗教儀式悼念他們，清明節期間，有關的居民亦會去那裡掃墓。」

奇聞趣事，記憶猶深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堂區神父在五十年代，有救濟品派發給教友。

「神父透過教會的關係，從富裕的國家，特別是美國，運來很多物資，例如奶粉、麵粉，甚至是芝士、牛油，特別是芝士……以前的人未見過芝士，很多居民不知道，拿那些芝士當作是勞工棍，用來洗擦衣服，發現『好肥』，後來才知道是攪錯了，這就成了笑話。」

陳先生憶述童年時會到牛奶公司買雪糕吃，位置是現時中華廚藝學院附近，那舊式建築就是當時賣雪糕的地方。

「那裡以前是凍房來的，牛奶及雪糕等就全部存放在那裡。有時我們買牛奶就是在那個更亭旁邊的小房付錢，然後往凍房那裡拿鮮奶。」

當時，細杯雪糕（俗稱蓮花杯）賣三毛錢一杯，大杯賣五毛錢一杯，雪糕磚就要一元兩角，但原來對小孩來說已是價值不菲。

「但我們零用錢只有『斗零』五仙或一毛錢，對小孩來說算是很貴的了，通常都要儲很久才能吃一次……我記得那時很少有機會可以嚐到蓮花杯的。」

40

真誠的人際網

至於購買日常用品、食物，他們常到薄扶林村，久而久之，兩處居民融洽的人際關係網絡逐漸形成。

「薄扶林村的商店，基本的餸菜及雜貨都有供應，例如牛肉、豬肉，蔬菜、生果等。太古樓內也有一間士多，四十七號地下，我們叫那昌記士多，是家庭式的，前舖後居。我們會在那裡買糖果、零食、汽水。另外有個婆婆，她在十七號門外有個小攤檔，是賣糖果、麵包的……也有好幾款餅食。十五號地下也有粥檔，這都是居民購買早餐的地方呢。晚上薄扶林村有些人擔紅豆沙、綠豆沙來太古樓賣，就在附近「冷巷」叫賣，居民聽見叫賣聲就會走出來光顧。」

「小販通常擺檔就會擺在不太當眼的地方，因為無牌小販的罪行在和平後初期是很嚴重的，罰錢，坐牢不在話下，最慘的就是那些無牌販賣鮮魚的小販，定罪後，要被遞解出境的，所以賣魚小販都要躲在一處賣，方便『走鬼』。還有一些小販，他們賣武、賣雜技，又或是有些『蛇王』人士，袋幾條蛇就稱自己是『蛇王』，會在冷巷進行這些商業活動，吸引很多居民圍觀。」

冷巷因此成為太古樓居民的聚集地方，在假期時，連在薄扶林村替人補鞋的補鞋匠亦會到太古樓擺檔，可見當時環境經常熱鬧得很，真的十分精彩。村民一般都不必經常外出到港島市區。

太古樓的居民和牛奶公司員工的關係也很好，這是因為孩童會經常到牛房附近嬉戲，而有部分牛房員工其實亦是太古樓居民。

「因為太古樓有些居民在印書館結業之後，有很多轉了在牛奶公司工作，與牛房工人都很熟絡的，他們主要是在牛房內工作；例如揸牛奶、担奶桶、或擔任運送洋草或牛奶桶的司機。」

回憶的尾聲，太古樓的反思

對於陳先生來說，其中一項最有印象的事情是他曾擔任輔祭。

「我記得在做輔祭的時候，有隻航空母艦訪港，堂區獲分配廿個名額上航空母艦參觀，我們有廿多名輔祭，當時一位副主任司鐸朱神父考我們拉丁文，他說考得好才能夠上去，當時大家非常之用心背讀，好彩合格，有份去，印象很深刻呢。」

太古樓的回憶讓陳先生反思：

「搬離太古樓，我多年來均在南區居住，坐汽車經過舊址時，內心都很懷念及感慨。太古樓雖然被拆卸而令到居民各散東西，但鄰舍及教友之間的感情從未冷卻過，我們組織太古樓之友，藉著每年的露德聖母瞻禮日，大家聚首一堂參與感恩祭，分享生活近況。隨著歲月流逝，久不久聽聞年長的太古樓之友離我們而去，內心很懷念他們。如遇有『白事』發生，我們更會互相通報，向有關家屬致慰問及出席相關禮儀。」

「回想孩童年代，生活好像沒有甚麼方向，玩玩下，見步行步的感覺。但年長後，太古樓常常給我一種感覺就是……他給與我在孩童時一個成長的地方，為一班居民來說，太古樓更是我們的集體回憶，特別在宗教信仰方面，透過傳教士的教導，我們堅信我們的信仰，承行主旨而生活，對每位太古樓之友都是非常幸福的，因為我們知道生命的終向往那裡去呢。」

陳詠梅：太古樓歲月忘憂

撰文：溫國珩

42

憶起太古樓的人和事，開心的往事從陳詠梅的心扉溢出。50年代出生的陳詠梅，與大部分太古樓居民一樣，縱然生活環境欠佳，資源匱乏，但仍然擁有一個難忘愉快的童年。太古樓對於她來說是一處忘憂谷，每次回首，仍舊會會心微笑。她最難忘的是太古樓那氛圍——虔誠與喜樂。

「有一位朋友曾問我如果將來有機會重建太古樓，那怎麼辦，我答她只要給回我太古樓二號二樓就夠了！」

陳詠梅認為其實很難說甚麼是「最」難忘，因為在那段時間，每個人，每件事也是無價、不可取代。她成長於太古樓，如果用一個詞語概括她對太古樓的回憶，筆者認為是「童真」，而她所享受的正是上天賦予每一個兒童應有的自由無拘束之樂。

「我們其實好開心，我們經常爬樹、行山、享受大自然風光，我們坐著乘涼，很涼爽、很涼爽。」

一、童年「吃、喝」

在孩童未了解成人世界之「生、老、病、死」前，他們會先接觸「吃、喝、玩、樂」。對於陳詠梅來說，太古樓有很多「滋味」的回憶，雖然不是山珍佳餚，但吃得快樂往往比食物本身的價值重要。

「豆皮沙翁」與她的鐵箱子

每日當聖華小學的小息時間開始時，一位女士就會擔著兩大個鐵箱子到學校附近擺攤子，陳詠梅稱她為「豆皮沙翁」。她賣的零食種類多，因此她非常受學生們歡迎。

「她賣很多東西，雪條、餅乾、糖果、雪木瓜、雪菠蘿、花生等等。以前流行的零食她都有賣。」



「烏達」的糖水

在太古樓的居民晚飯過後，「烏達」就會擔著兩個沙煲，裝滿糖水在太古樓叫賣。

「『烏達』的個子很小，黑黑的，皮膚很黑，一個擔挑，擔著兩個沙煲，裡面有芝麻糊、綠豆沙或者紅豆沙等等，夜晚就來到『肥冷巷』賣，『烏達』一來，我們就會立刻去買。」

「如來神掌」與汽水

電視機對於昔日太古樓的兒童來說是一件奢侈品，因為想看電視，就得付款。陳詠梅記得太古樓3號的屋主是第一個擁有電視機的居民。

「我們很想看電視，當時特別想看『如來神掌』。於是我們就到她的家看。不過要給錢的，要不然你就向她買零食，如買汽水、啫喱、大菜糕等等，要不然你就直接給她斗零作入場費。如有好看的粵語長片，我們就會擠滿閣仔，等待劇集播放。」

魚蛋佬與油墨齋

陳詠梅認為最經典的小吃是魚蛋與齋。她稱賣魚蛋的叔叔為「魚蛋佬」。他的攤子就在聖堂對開的空地。每逢小息，他就會將攤子擺放在大地附近，向學生售賣魚蛋。

「不過，最難忘的是他賣的齋，我一生再沒有嚐過這麼好吃的齋。可能我們小時候沒有特別豐富的資源，所以所有東西也覺得十分好吃，那份感覺是我一生以來，找不到的了。以前科技沒有那麼先進，於是我們用報紙包著齋來吃。其實報紙有很多油墨，但我們一樣照吃，我們還會舐淨報紙上的汁，反正每個小孩都是這樣大。」

二、童年「玩、樂」

44

用今天的標準來看，或許太古樓的遊樂設施不多：只有一張乒乓球桌、一個用作籃球及足球的球場、一個給兒童攀爬的鋼架。但是，太古樓卻保存了現今香港社會缺乏的東西——空間。當有了空間，兒童就可以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創造出各種不同的遊戲。難怪當陳詠梅談及兒時的遊戲時，眉飛色舞，巴不得將她最重要的生活點滴娓娓道來：

「大家一起頑皮、一起玩。大家都是集體玩，有時到我這邊的樓玩、有時候到他們那邊。每一個的點滴都不同，我們坐在一起，就會談天說地，大笑一番。」

女孩經典——紙公仔

回想童年時的玩具、遊戲，陳詠梅第一時間想起的是紙公仔。說起紙公仔，她立時手舞足蹈，向筆者比劃如何製作。

「我們會先自己畫一個公仔樣，然後畫些衣服給它穿，那個公仔的衣服是可以換的，比如這是一條裙子，我們會在上面畫花、畫鈕扣，塗顏色，然後會把裙子剪下，把上下摺疊，便可以掛在紙公仔身上。然後我們會做褲、做鞋、做不同的衫。」

打生波

幾乎每個太古樓居民都聽過「打生波」這個遊戲，這是遊戲中的經典。

玩法：4-8人一隊，如壘球運動般在地上畫上幾個壘。當中的一隊會負責投球（網球），其中一隊會負責打，擊球的工具就是自己的拳頭。投手投球時，隊友則散開在周邊位置，預備接球。投手投球後，擊球手若然成功擊球，他則要開始跑壘，而投球手的隊友則要盡快拾回網球，將球投回壘中。球一回到壘，擊球手就要立刻停步，若然擊球手正在跑壘，而球已達壘，擊球手則即時出局，俗稱「死」。如果擊球手成功跑完全壘，則可以使已出局的隊友重新入局，俗稱「救」，遊戲直到擊球一方全部出局。

水底捉窮人

玩法：人數不限，大家各自將拖鞋放在「大地」中，選一個人去看守拖鞋。其他人要用盡方法把拖鞋奪走，若然拖鞋看守人成功捉拿其他玩家，其他

玩家即成為其中一個拖鞋看守人，要即時幫助捉人。這直到拖鞋全部給人搶走或者所有玩家被抓而成為看守人，遊戲則會結束。

放紙鳶

今天常在郊外或者海灘看到紙鳶高飛，放的人樂在悠哉。不過，縱然紙鳶同樣高飛，因應玩家以及玩法不同，放的人卻緊張萬分。

「我們自己沒有錢去買（紙鳶）。我們通常用紙及竹自製紙鳶。我們還會將一些玻璃樽砸爛、砸碎，燒熔，用來『蠟線』。『蠟線』即是將紙鳶的線穿過融化了的玻璃，線就會沾上燒熔的玻璃，變得很鋒利，那我們就可以放上天，用來『界』斷別人的紙鳶線，那我們就可以去把斷線的紙鳶檢回來。我們放的時候特別緊張。」

三、童年趣聞

頑皮是孩童的天性，而每個孩童背後都有屬於自己獨特的趣聞。

「常說我們的口述歷史跟另一個說的差不多，其實不是，因為每一個人的回憶也很獨特。縱然大家也是住在同一個空間，但每個人家境和生活『玩法』都不同。」

室內釣魚

陳詠梅憶起以前她的姨姨一家住在14號，而住在樓下13號的那一家人在天井中建築了一小型儲水池，池裡養殖了金魚。記得有一次，她的表哥趁所有大人上班時，在自己家中用一枝竹竿偷偷垂釣樓下的金魚。頑皮、偷玩、開心就是他們的性格。

「我們互相分享，討論他怎樣頑皮，而你又怎樣頑皮貪玩，每個人也有不同，我以前的回憶，可能他們未必經歷過。」

同學參觀太古樓

讀中學時，陳詠梅其中一個同學到她家作客做專題研習。她的同學從來

不曉得太古樓的存在，因此，當她第一次走進太古樓，彷彿有點「竹林深處人家」的感覺。她好奇為何家家戶戶的門戶常開且容許其他人自由進出？陳詠梅微笑答道：

46

「這是因為我們彼此間互相認識和信任，不論老幼。因此只要有陌生人入村，我們全部都會知道。我和同村的朋友就像兄弟姊妹一樣。」

乳牛的零食

太古樓的居民經常會到牛房附近嬉玩，他們曾看見在牛棚裡的乳牛常常舐地上一些外形光滑、咖啡色的石頭。

「我們不知道，整天在討論，我們估計那石頭是朱古力。」

直到長大了，陳詠梅才知道那些原來是藥，是一些類似抗生素的藥，可以增加牛隻的抵抗力。

乳牛出走

太古樓的居民有部分替牛奶公司工作，當中有一件趣事特別令陳詠梅印象深刻。

「我記得三號住了一個伯伯，我們稱他為南叔。有一年牛奶公司有員工下班時忘記關上其中一牛棚的閘門，於是乳牛便撞閘而出，一直跑到太古樓。當時有人正在運送夜香，他看見牛群一湧而下，驚慌失措，把夜香桶倒瀉在地上。於是，居民立即通知下班的南叔，希望他能幫忙趕走牛群。成人擔心牛群走散，我們作小孩的則當一齣電影看，開心得很。」

太古樓內的武館

「梁輝」是太古樓的一個跌打師傅，他亦教授拳術。雖然陳詠梅沒有隨他習武，不過卻知道有一些居民跟他學拳。陳詠梅最深刻的是新年的舞獅。梁師父自己有一獅頭，每年他都會訓練徒弟在新年時醒獅，爬上一枝長竹竿上「採高青」。

「採青非常好看，我們在地下，會跟著鼓聲走來走去，打鑼打鼓，很熱鬧，很開心，很多小朋友出去湊熱鬧。」

神功戲與拾斗零

每年農曆七月，草寮村（又稱為鶴佬寮）的村民都會祭祀中國的傳統鬼節，太古樓的居民當然不會參與祭祀活動，不過對還未懂事的孩童來說，熱鬧就是熱鬧：無宗教、無國界、無年齡的分野。陳詠梅亦曾湊過鬼節的熱鬧。

「那時我們並不懂事，我跟哥哥和他的朋友去草寮。他們大多也是居住在太古樓。在鬼節時，大人會向地下撒斗零或一毫子，其實係象徵式給鬼用的。但我們作兒童的，根本不曉得，我們跟在大人後面拾斗零，拾完便有錢可以買東西吃。」

傳統節日

太古樓的核心是天主教信仰，而太古樓亦是一條教友村，不過，這不代表居民完全放棄慶祝中國傳統的節日。陳詠梅認為慶祝傳統的節日當然不是出於迷信，而是出於熱鬧。她舉了新年以及中秋作例子。

「我家吃團年飯的那一晚，就會燒一串很大的炮仗，大年初一，又出去燒炮仗，聖堂也有燒，我們小時候喜歡玩「地炮」、 「滴滴金」，還有玩「火箭炮」、「龍吐珠」，我們將「火箭炮」插在汽水樽裡，然後點著它，它就會飛上天，然後『嘭』一聲爆炸。」

「到了中秋節我們就在門口、騎樓放一張桌子，上面放滿了月餅、菱角、芋頭、水果，我們還掛滿了燈籠，就這樣一起出來賞月、聊天，有些燈籠是我們自己做的，用一個小的月餅盒，穿一些孔，用一條繩子穿著拉著走。還有用柚子皮，割一些孔，放上蠟燭，光就從孔中透出來，很漂亮。」

太古樓的居民就是在這遍歡樂氣氛下成長，一起經歷「喜、怒、哀、樂」陳詠梅的童年沒有多物質的享受，簡單但不單調。反觀這年代的件兒童，物質充裕，卻少了足夠的空間讓他們天真、讓他們忘憂。

蘇約翰：太古樓情 點滴存菁

撰文：劉佩欣

48



五四年，是教友蘇約翰誕生的標誌年份；太古樓，是他出生的標誌地方，兩者對他來說都有深刻意義。對後者的情感，直到現在，依然長存心中，蘇教友娓娓道來，帶我們回到他在太古樓的時光，一同去經歷段段難以忘懷的細節，還有去感受那份珍而重之的情份……

童年生活 歷歷在目

蘇約翰回憶說：「我爸未來港前就在這個順德，廣州的石室替神父工作的。我爸是直接到聖堂工

作的。替神父洗衣、打掃、領聖體，還做那些……那些我們現在稱為輔祭的工作。」後來父親自願來香港，曾在八角樓和政府印務局工作，定居太古樓。自出娘胎到二十三歲，籍貫順德大良的蘇約翰一直與父母和七兄弟姐妹，熱熱鬧鬧，同住在太古樓二座廿二號，而對於童年生活的細節，他是巨細無遺的。

聖華小學 回憶幕幕

曾在聖華小學就讀的蘇約翰難忘學校裡的職員及姑娘，她們有嚴厲的一面，亦有包容的一面：

「有些姑娘很嚴的，很嚴的。嚴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的操作不好，她就不會讓你上學一個星期，讓你留在家，別騷擾到別人讀書。」而好動的蘇約翰就因為「太」好動，被視為頑皮的學生，所以讀到四年級就離開聖華學校，轉到華富村繼續學業，他回述說：「姑娘就說：『這麼頑皮，不如回家休息一下吧！』。這些情況時有發生的。休息一個星期或幾天不等，其實就不是

把你趕出校的。那家裡就說：『這麼有趣？不讓你上學，那你幹嘛？不如這樣，落下面找學校讀書吧！』。」

除了華富村，蘇約翰說有些學生會選擇到其他地方讀書，例如有田灣、薄扶林，還有更遠的聖保羅男校和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等西營盤地區中學。雖然未能在聖華小學畢業，但這個轉學經驗對蘇約翰來說實在是難忘，足以銘心刻骨。

兒時玩意 永恆情結

蘇約翰在太古樓的物質生活並不充裕，但和太古樓朋友的玩意卻是包羅萬有，豐富多姿。他笑著回憶說：

「自製玩具就那些汽水罐的那些蓋子，揀扁它們，鑽兩個小洞，玩「扯扯」，大家鬥割……把它（汽水蓋）揀扁了，就會變得大塊一點，接著再弄兩個小洞，用一條繩把它綁著，大家鬥玩。」他又興致勃勃的介紹每個童年遊戲：「小巷，就在這裡和這裡。那玩些甚麼呢？就玩那些「拍公仔紙」。嗯，這些呢，有些泥地，就有些叫做……那些叫做甚麼呢？就拿一把刀……拿柄刀插在泥裡，如果插得到的話，你有個、有個三角形的，即是規限著多少吋。你插在這裡，就得一直插著，如果跌了下來，就當是去到那個位置為止，就不可去到那裡。就玩這類的東西，彈波子……就玩那些「飛Mug」。「飛Mug」即是有個圈，那麼你就將那個「飛Mug」、「牛奶Mug」弄扁，扔到別處，另一個人就負責撿回來，然後呢，你們其他的幾個人呢就要躲起來，那如果見到……見到你呢，就當你輸了；見不到你，而你又跑來拿回那「飛Mug」呢，就當玩完，又再重新開始過這樣。」

說罷，蘇約翰的眉頭是寬容滿足的。

不僅如此，蘇約翰還意猶未盡的介紹叫做「老虎頭一家人出」的遊戲：

「就要單腳，就在這裡畫了個框，不准走過這個框，那你就需要單腳去捉他們。捉到呢，你就要走回這裡，那如果你還未走到呢，當有五個人玩吧，你捉到一個有四個就打你的屁股，就一直……那你見到一個後就要即時走進去，若非如此，你就會被打屁股的了。那進去後呢，你們兩個就要單腳去捉這四個。如此類

推，你捉完所有人後就玩完了。那你呢，第一個玩的那個人就不用再猜做捉的人，其餘的就要再猜，做單腳捉人的那個。」

詳細的講解、投入的述說，可見蘇約翰有多懷念在太古樓的童年生活。

貪玩的蘇約翰還會和友伴去偷樓下屋前所養的金魚和種的番石榴，還會放紙鳶、在洋草山的牛房旁邊割紙鳶。割紙鳶，一個現今陌生的玩意，蘇約翰又再眉飛色舞地道來：

「那我們『割紙鳶』就會將一些玻璃瓶弄碎，然後用一些魚膠……買些魚膠煮溶，再把那些玻璃粉也放進去。然後，就由這裡至到牛房那兒，『蠟線』……『蠟線』即是指有一條線，你就找個膠瓶，在瓶身上鑽兩個小洞，接著就將那些魚膠和玻璃粉在那條上線過，在那個瓶上過……『蠟線』，蠟那些玻璃線作放紙鳶之用，用來割的……很刺的、很鋒利的，那裝上去後就能跟別人割紙鳶。」

說畢，蘇約翰又笑了起來，像小孩一樣。

「拍公仔紙」、「泥地遊戲」、「彈波子」、「飛Mug」、「老虎頭一家人出」、放紙鳶、割紙鳶……這些都是蘇約翰最快樂的童年玩意，都是他所珍惜的記憶，更重要的是，它們是蘇約翰和他的兒時友伴在太古樓共度童年的集體回憶，友誼的珍貴、情感的真摯，已深深透露在他的述說裏。

換取錢物 各適其適

蘇約翰憶述看電視的經驗：

「我記得那時偶爾會有電風扇，連電視機都沒有。有些人有電影機，他們的電視是收費的，如果你去看的話，好像要收大約斗零，那我就會到那裡看電視。不是每家人都有的，在四十九家當中，我想只有兩、三家有電視機，而其中一家就會收費的。如果你去看，他就會給你一張小板凳，進去屋裡看，看完就收錢的。」

爲了得到更多零錢，他和友伴都有各種儲斗零的「招數」，例如在牛奶公司大班的網球場附近撿網球，退回去的網球會換來斗零。

他也會捉草蜢和草龍賣給養雀的人，賺取零錢：

「在晚上，尤其是夏天，很多時都會到牛房那兒逛逛，散散步。對了，有時候就捉那些草蜢，捉來賣給其他人，那些養雀的人，就大約斗零、一毫一隻。我們還捉那些「草龍」……它們類似蜥蜴，但尾巴較長。當時牠們是頗貴的，好像是五毫還是一元……就給那些畫眉，有沒有聽過畫眉？那些雀叫畫眉，讓牠們吃草龍後唱歌會唱得好些。」

更有趣的是，蘇約翰可以用破了的膠拖鞋向小販換麥芽糖：

「那時有人賣麥芽糖的，放小息的時候，用兩塊餅乾夾著麥芽糖。他（小販）收集的拖鞋不知道有甚麼用途，那時我太小了，有可能是拿去再造，諸如此類的。」

換取得來的零錢，蘇約翰會買買材料弄玩意、看看電視、享用零食，如向在太古樓擺「梗檔」（即是一定在固定位置擺檔的攤檔）的七叔婆買小食，有餅乾、糖仔、麵包等。在太古樓，簡單的換錢換物童年，足夠讓蘇約翰懷念一輩子。

大時大節 凝聚居民

說起傳統節日，蘇約翰憶述會在太古樓慶祝中秋節，玩燒蠟燭和玩燈籠；也會在端午節吃粽，農曆新年，還沒禁止燒爆竹的時候，居民更常常燒爆竹，新年氣氛一流。讓蘇約翰最記得的還是婚禮和葬禮：

「最記得有一次，有些外籍人士在不知道一九七五還是七六年，就在太古樓結婚，接著還派糖。那兒極度熱鬧，那些小朋友都在拾糖、派糖等等，很是熱鬧。」

「葬禮就是很特別的。不知道是不是習慣，總之每每有人死了以後，人們都會在這裡不停走，走到……大環新村那裡。走到大環新村那裡就會停，然後就會上靈車再走的。我們尾隨著他們，因為會派那些吉儀。吉儀，不知道是一毛錢還是斗零，派完我們就會離開，接著我們就會有錢用了。」

對於蘇約翰和太古樓的小朋友來說，這種葬禮，在尾跟隨，有斗零拿，是一件多新鮮、多興奮的事。

生活樸素 簡單自然

52

居民在太古樓的生活十分樸素，有些住戶爲了節儉，連電也不用，用火水燈泡，而且在早期，未有能力買火水爐之前，煮食的柴火也要自己準備，蘇約翰：

「沒有人會花錢買(柴)的，每個人都會自己去砍，因為這裡有整個山頭，現在這座山還在。這座山很大的，那人們就自己去砍柴，燒得整個廚房都黑漆漆的。全部人都會自己去砍柴，沒有人會花錢去買的。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人，他一定是很富裕。」

另外，蘇約翰回憶說廚房是用來燒飯和洗澡的，因為沒有燈，而且不可浪費食水，洗澡不是在洗手間的，對他來說，小時候在廚房裏面洗澡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在左側窗邊就給架起來，用作洗碗等等；這邊就用來煮食的；這裡又架高了，用來放柴；那你就在另外這裡洗澡。當時沒有花灑和其他工具，就用一個勺子，放些水進個桶裡面。就個桶裝些水，然後用個勺子把水淋在身上，擦擦後再用勺子往身上淋水，再擦擦就成了。那時一塊肥皂就能夠洗頭和洗澡用，洗甚麼都用它了。」

簡單的洗澡，足夠令當時的太古樓人滿足開心。

情味濃厚 永牽心弦

「人家有甚麼，我們就想要甚麼，不會的。就是享受那個年代，還有那個生活。因為我們每家人都沒有關門睡覺的，全部都沒有關門睡的，每個人都打開著門睡覺。唯一會關門睡的就是刮風的時候，刮大風，那每個人都會關門，其餘的時間都沒人關門睡的。地下跟二樓都是如此的，不會有打劫等等的事情的。」

這種夜不閉戶的生活，在現今香港很難想像，但就是這種全無機心、互

相信任、淳樸簡單的生活態度讓蘇約翰念念不忘。

說到難忘之最，還是牽掛在蘇約翰心中的太古樓人：

「其實最難忘的是那裡的人，還有那個環境，因為我們就是自成一角的。很難找到如此的地方，而每個人都是信教的、去聖堂，大家一起去聖堂，即是有些甚麼節日，要做的我們都會去做；甚至乎晚上七時聖堂會開彌撒的，我們有時候就在出面踢球，然後神父就會出來：『為什麼你們不上聖堂，卻在這踢球啊？全部不准踢球，人來聖堂！』。明神父，那時就是明神父拉我們進聖堂的。對啊，那時候每個人都是這樣的。我們太純了，太純，真的好像一張白紙一樣，神父說什麼，我們就做什么。真的，除非有人帶壞我們，如果不是，我們是不會做一些沒有做過的東西的。對小孩子來說，最開心的就是一起長大，一起大，感情很好的。直到現在，我們還是這樣，我們很多人都還有來往。」

可見太古樓每人都在天主的寵愛、神父修女的照顧下成長。

講起神父修女的無私，蘇約翰說連生病，神父修女也會照料，又對明神父的印象特別深刻，表示不少人也被他感動：

「其實有很多人本來不是信教的，自從這個神父來了以後，他就令其他人信教。這個神父真的很好，怎麼個好法呢？以我所知，他就去認識那些人，那些壞孩子、沒有人理的、父母外出工作的那些，神父就將他們帶入來太古樓，讓其他人可以收養他們、讓他們寄宿等等，已經做到這樣了。那他們的父母見到這個神父這麼好，所以就信教了，又讓兒女們都信了。對啊，即是那時候神父已經做到這件事了。就是，你不信教不要緊，如果我能幫你的，我就幫。很厲害。」

他一邊述說，一邊微微的莞爾，一副感恩的表情，吐露著太古樓的人情味，令人動容。

太古樓裏洋溢的人情味，心中滿載的回憶，點點滴滴都一直在蘇約翰的心田不斷昇華，永誌難忘……

太古樓的人和事

羅淑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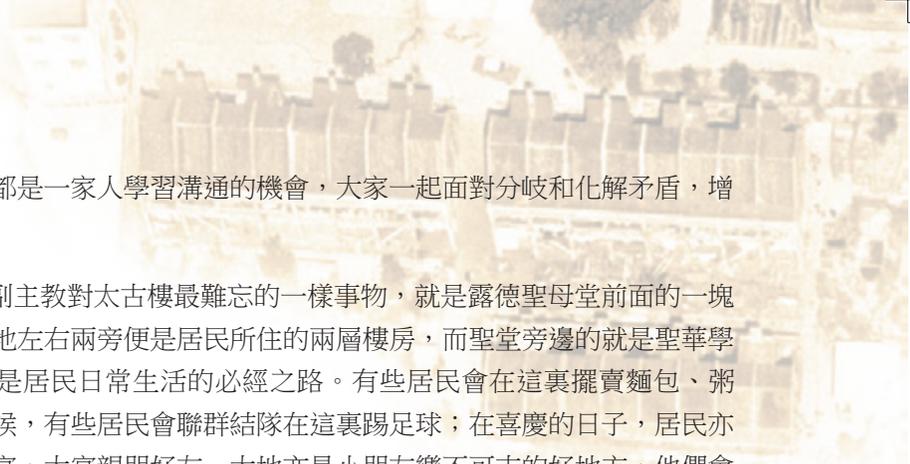
香港演藝學院助理客務經理¹

54

太古樓建立之初，目的是為納匝勒印書館的員工及其家人提供安居之所。納匝勒修院的神父除了想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及照顧他們的生活之外，亦悉心領導他們的靈修生活，所以太古樓的48個家庭都擁有天主教的信仰，這亦是太古樓最獨特之處。令太古樓居民最懷念的，相信是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由白英奇主教（Bishop L. Bianchi）委任為露德聖母堂本堂司鐸的明之剛神父（Fr. Rene Chevalier）。明神父服務露德聖母堂達十九年之久，他對工作的熱誠和處事公正的態度，深深印在每一位居民的心中。他的慈愛、仁心和忍耐，引領太古樓居民渡過不少艱難的日子，居民都銘記於心，並稱之為露德聖母堂的「黃金時代」。

天主教的信仰深深影響每一個居民，日常生活簡單而樸實。每一戶無論大大小小，大家都互相認識，有些家庭甚至會建立姻親關係，彼此友愛團結。白天的時候，大部分住戶都大開中門，如果大門關閉，即表示屋中人不在家的意思。夏天黃昏的時候，大部分居民喜歡在家門前聊天，乘涼和打麻雀，有些家庭會在屋前品嚐晚飯，甚至晚上的時候，有些人乾脆把摺床開在家門前睡覺，連門也不關上直到天亮。雖然如此，太古樓從未有失竊案例，真所謂天下太平，現在每一位居民都十分懷念這樣的生活。

當明神父出任本堂司鐸的時候，其中一項最特別的服務便是接載太古樓的孕婦，到鄰近醫院分娩。當年其中一位曾經享受此項服務的居民，便是今天天主教香港教區陳志明副主教的媽媽。陳志明副主教的家居於太古樓23號地下，他在大約6、7歲的時候，便在聖堂當輔祭，每天早上都參與彌撒。天主教的信仰生活，對於陳副主教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令到他和另外兩位同學起了入修院的念頭。當訪問陳副主教關於兒時太古樓的生活，他的臉上流露出幸福的笑容，顯然童年的情景仍深深影響著他，情懷依舊濃厚。他憶述當年這個公教村（意指全村居民都是天主教徒）的風貌，就好像一條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鄉村，村內充滿初期教會樸素、虔誠的宗教氣氛，位於村內的露德聖母堂，每天都有居民參與彌撒。居住在太古樓的48個小家庭，生活在同一個村內，感覺就像一家人一樣，是一個大家庭；有快樂、和諧的日子，也有爭拗與衝突的時候。由於大家之間的關係是由宗教來維繫，並非單靠姓氏維繫，就算出現分



歧甚至衝突，都是一家人學習溝通的機會，大家一起面對分歧和化解矛盾，增進彼此了解。

然而陳副主教對太古樓最難忘的一樣事物，就是露德聖母堂前面的一塊大地。這塊大地左右兩旁便是居民所住的兩層樓房，而聖堂旁邊的就是聖華學校，所以大地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必經之路。有些居民會在這裏擺賣麵包、粥品；假日的時候，有些居民會聯群結隊在這裏踢足球；在喜慶的日子，居民亦會在這裏擺喜宴，大宴親朋好友。大地亦是小朋友樂不可支的好地方，他們會在這裏玩「九宮格」、「打山波」及「拋罐頭」的遊戲；新年的時候，更會在這裏放煙火，充滿節日的氣氛。這塊大地正是居民生活的中心，由於生活中都有天主的臨在，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通過種種接觸和相遇，互相建立友愛關係，建立穩固的信仰根基，令到太古樓的歷史及居民間的團結精神得以延續。

周瑪莉小姐是陳志明副主教姐姐的童年好友，她的家庭居於太古樓29號地下，當她談論兒時在太古樓的生活時，笑聲是打從心底裡發出來的。周小姐認為太古樓的生活，物質上儘管並不豐富，但是精神生活絕對是豐盛的。她們一班小朋友最喜歡由伯大尼修院步行到山坡下的海灘游泳，這個海灘最特別之處，就是一景一物全是天然，絕無現時海灘那種人工化的味道。往海灘的途中，她們會經過一排小平房，每間平房前面都有一塊農田，農民會種植大樹菠蘿，番薯及各種各樣的蔬菜，環境自然優美。由於小朋友們大多數都不懂得游泳，所以她們會利用汽車輪胎的內膽，吹氣後作為救生水泡，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是十分環保的方法。游泳後，她們便會背著那個重重的水泡步行上山，雖然路途遙遠，但是一邊走一邊嬉戲，有著無窮的樂趣。除了去海灘游泳之外，周小姐與朋友們也喜歡到薄扶林水塘郊遊及野餐，當時，社會上還未流行燒烤的玩意，她們需要把家中的烹調用具帶到水塘，然後就地取材，看看附近有什麼時令的蔬果，例如香蕉、番薯，便會一起煮食，像玩家家酒一樣。由此可見，簡樸的生活也可以相當美好。能跟朋友甘苦與共，與家人樂聚天倫，已是天下間最快樂的事。

周瑪莉小姐其中一位兒時玩伴，居住在太古樓31號地下的梁燕玲女士，她最難忘的事，莫過於太古樓裏有喜慶或者有喪事的日子。每當露德聖母堂有結婚典禮舉行時，小朋友通常會爬到石階上，湊熱鬧觀看漂亮的新娘；而遇上葬禮的時候，小朋友們就會跟隨出殯的隊伍，直至葬禮完畢，主人家便會派發一封白色的利是給隨行的人，裡面會有一毫子及一粒糖，小朋友便會用那一毫子到牛奶公司買雪條，所以小朋友們對此都樂此不疲。另外，有關聖母顯現的傳說亦不絕於耳。露德聖母堂旁邊有一座山叫做聖母山，那裏擺放了一座露德聖母像。傳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有很多居民看見一位身穿白色長袍的女

士，面容慈祥，站立在露德聖母堂的頂上，不費吹灰之力，只用她的長袍撥開日本空軍從高空投下來的子彈，在太古樓裏所有的建築物都保持完整，絲毫無損，住在太古樓的居民，都平平安安，而鄰近的其他建築物就受到不同程度的毀壞。自此之後，居民對露德聖母的愛戴，與日俱增。

56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對所有太古樓的居民來說，是值得高興的日子。為了紀念太古樓拆卸三十週年這個特別的日子，一班居民以「太古樓之友」的名義，於香港薄扶林演藝學院古蹟校園伯大尼舉行聚會。當日，包括老中青三代大約二百多人，聚集於伯大尼，甫見面已經談過不亦樂乎，像是要把分開三十年來的生活一下子與舊鄰居分享。「太古樓之友」邀請了陳志明副主教及小時候曾經居住在伯大尼修院的吳多默神父，在小教堂一起主持感恩聖祭，感謝上主對太古樓之友多年來的看護和眷顧，雖然伯大尼小教堂只能容納一百人，但出席的二百多人都緊貼在一起，座無虛席，連中間的通道也躋滿了人，就像舊時互相依靠過生活的日子一樣，氣氛溫馨感人。彌撒完畢後，眾人就移師到由牛奶公司牛棚改建而成的惠康劇院，回味一起在太古樓走過的日子，頓時大家都勾起兒時回憶，談得興致勃勃，歡笑聲此起彼落，場面十分熱鬧愉快。由此看來，太古樓的歷史非常重要，每一個生活小片段，都深深印在每一位居民心中。公教村這種生活方式，不但令居民建立信仰根基，更加強對太古樓的歸屬感；在回顧過往的同時，也讓居民延續家庭團結、宗教虔誠的精神。太古樓的拆卸在形式上只是一個損失，因為那是一個大的根源，每一個小家庭會繼續延伸出來，居民心目中那團不滅的火才是永恆。

1. 本文作者為「太古樓之友」，曾於「內外縱橫太古樓」圓桌會議發表此文。

一位太古樓媳婦的回憶

口述：羅秀英 / 撰文：陳德光

我母親羅秀英生於1917年，今年94歲住上水聖若瑟安老院，佛山福寧路天主堂是她的老本堂。本堂魯神父是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神父，神父往來佛山與香港之間，依母親回憶，過年給神父磕頭，獲得港幣5仙利市，是兒時愉快的回憶。

母親是第五代教友，年約十歲時曾至廣州石室聖心堂，參加舅舅張寵勤神父的晉鐸典禮。

民國初年鄉村治安敗壞，盜賊猖獗，外婆送母親到香港九龍城織布維生。後來經媒人安排，18歲（1935）嫁到香港薄扶林陳朝東先生家，與他的長子陳賜根也是第五代教友——我的父親結婚。

爺爺外號東叔生於1883年，住在薄扶林太古樓教友村頭的第二棟。爺爺同是佛山人又屬福寧路天主堂，十二歲（1895）被巴黎外方傳教會法國神父招募到薄扶林納匝肋印書館工作，爺爺兩個弟弟（三、四叔公）也同時被招募從佛山到印書館工作，分別住在第三與第四棟，每棟對面有空地養雞種菜。爺爺從掃地雜工到做管工，二次大戰日軍進入薄扶林村（1941.12），印書館被迫停業。

母親的結婚聖事在聖瑪加利大堂舉行，禮畢上薄扶林給爺爺倒茶磕頭，爺爺帶爸媽去納匝肋印書館與伯大尼修院給神父倒茶，晚上全圍擺酒，熱鬧非凡。爺爺送母親一本納匝肋印書館出版的聖教日課，書面用金漆寫上羅秀英德肋撒字。

母親婚後住薄扶林，親歷當時教友村的虔敬生活，早上一起唸日課，望彌撒，教會慶節有聖體遊行與聖母遊行。親戚中修道的有姑媽陳順金，當法國修院姑娘（沙爾德保祿會修女），姑媽於露德聖母堂百週年紀念特刊（1966）中有一篇紀念稿。爺爺每年追思瞻禮（11月2日）與三叔公、四叔公輪流回佛山掃墓。爺爺奶奶自己葬在伯大尼山仔，1966年檢骨後遷葬跑馬地天主教墳場骨箱。爺爺的父親陳榮宗（1847 - 1917）原葬於跑馬地聖地號碑3242，於1934年遷葬聖堂左側之骨箱。爺爺一生與教會關係密切，家族不是住太古樓就是葬在聖地。

父親於1910年生於太古樓，小時也幫忙過印書館的檢字工作，長大至牛奶公司做接線生工作，後來跟牛奶公司同事學習駕駛，考得駕照入潔淨局擔任司機。婚後一年搬至潔淨局（上環街市）後的車房，父親每月出糧都請母親回薄扶林服事公婆幾天。日據時代，日軍經常來薄扶林找花姑娘，太古樓女教友為躲避日軍，以廚房的鍋垢塗個大黑臉，奶奶驚慌過度，於1942年去世。

爺爺活到1945年10月，死前從東華醫院回家，睡在老家大廳，當天天亮時傳出爺爺大喊：「耶穌！瑪利亞！若瑟」，聲音從大到小，大家把火水燈點著，爺爺已經斷氣。母親說爺爺應有善終，生命最後一口氣都意識清楚，不忘唸經。其實，爺爺老家的大廳我記憶猶新，因為小時後上薄扶林小住，我都睡在閣樓，眼睛看下去剛好就是傳說爺爺善終的大廳。

我個人生於1952年，12歲曾進聖神修院，目前在臺灣工作，記憶中有太古樓教友村村口芳香撲鼻的九里香，看過修女在露德聖母堂與聖華小學之間操場放映的大型電影，聖堂有歐洲鄉村風格，是教友生活的中心。這些都是祖先信仰的歷史，雖有時間的距離，心中卻歷歷在目，值得珍惜，願意與大家分享。



太古樓十八號二樓

黃桂蘭

太古樓是一條教友村，在早期的時候全村的人都是信奉天主教。我們屬於露德聖母堂。我們全家由爺爺到我們這代都是教友。我爸爸和他的弟妹，在嬰兒時便受洗了。很巧合，我的母親也是來自一條教友村—鹽田梓，有着同一的信仰，真是天主的恩賜。

爸爸出生的時候，便是住在太古樓，不過不是在這層樓。因他出生時，這座樓還沒有興建，而是住在另一樓房。後來因他們住的樓房拆卸，而這樓房亦新近落成，於是便搬到這房子了。我爺爺，嫲嫲、叔叔及姐姐們都是住在地下十七號。我記得爺爺是在八角樓的廚房工作，給神父煮餐。

幼小的時候，我很喜歡聽爸爸及鄰居講述他們小時候的生活點滴及趣事。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他們講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佔領香港的經歷。他們說：在二次大戰時，有很多炸彈落在太古樓附近，幸好一個都沒有爆炸。後來有一次炸彈剛好要在他們住處落下時，圍仔（薄扶林村）人看見天空中，有一個人形的物體將炸彈撥走，不至落到地上。眾人都相信是主的保佑，免卻於難。

在我懂事時，明之剛神父已是本堂司鐸，他克苦勤儉，非常慈祥、有求必應。只要他能做到的，一定答應，就算非他能力範圍做到的事，他都會去尋求可行的地方或人物去解決。他很愛惜教友，是值得我們尊崇及敬愛的神長。那時每天我們都會到教堂念早晚課，當時覺得只是指定動作，現在想起來也非常慚愧。明神父除處理聖堂的事之外，更到醫院探訪病人或其它地方家訪及福傳。暑假期間，他更會安排一些活動，給我們參加，例如宿營等。

聖華小學是一座落在村內，由法國巴黎女修會主辦的學校。村內的小孩子都在這裏接受小學教育。我覺得非常幸運，在我們這個小區內建有學校，真是主的恩賜。修女們除了打理學校外，亦會處理教堂的一些事務，她們雖然只參與部份日常的教務工作，但亦本着誨人不倦，有教無類的精神，積極培養我們德育方面的發展和薰陶，詩歌班是由她們負責訓練的。我記得在小四時開始，每星期有幾天在放學後，要到神父辦公室的隔壁練歌，以便在大瞻禮彌撒時詠唱聖詩。修女們成立了樂鋒會，經常舉辦一些課外活動；例如參觀汽水廠、離島旅行等，這都是令我非常雀躍的。小學畢業後，我轉到市區升讀中學。中學畢業後，便出來社會做事了。

那時交通並不像現在這麼發達，早上上班時，乘搭公共巴士十分困難。因我們的住處是中途站，巴士來到已滿座，經常上不到車，運氣好的話，有時搭順風車。有一天早上，巴士站已有一大堆人在候車，等了很多輛巴士也上不到車。後來遇到同村的人，他的車子剛好有空位，於是我便乘坐他的車子上班去。正當高興都來不及，便發覺車子有些不妥，當時正在伯大尼的彎位，車子不受控制以「之」字形高速前行，駛過對面行車線。我被嚇昏了，到回復知覺時，整個人捲曲在車裡，車子反轉了，四輪朝天，推前大約二百米左右。當時正是繁忙時間，這段路亦是由中區往南區的主要通道，那時的道路是非常狹窄的，如有對頭車也要慢駛。可幸地當時沒有對頭車，如有的話，真是不堪設想了。幸運地其他人沒有大礙，我只是擦傷面額、雙手和左邊面骨腫了一些。當時我只是覺得幸運而已，但回想起來，在這段時間怎可能完全沒有對頭車，我相信這是主的護佑，我們才幸免於難。感謝主的恩寵……

我的幼年、童年、少年及青年都在這地方渡過。這裡給我很多美好的回憶。我很感謝主給予我的福份，能夠在這裡成長。家境雖然貧窮，沒有玩具，沒有華衣美食，卻依然活得快樂。左鄰右里如兄弟姊妹般相處，有如一個大家庭，互相守望相助，正所謂遠親不如近鄰，一點也沒錯。晚上我們喜歡聚在聖堂門前談天說地，到深夜也不願回家睡覺。

雖然現在太古樓已拆卸了三十多年，但那時的生活片段仍是正歷歷在目，遺憾的是，現只能想當年了。住在太古樓的歲月是我最快樂的日子，無憂無慮，一大班好朋友，好鄰居，沒有利害衝突，不會爾虞我詐，大家可以坦言說出心底裡的話。直至現時，我們一班兒時玩伴，時常都有聯絡及聚會。同時我們亦成立了太古樓之友會，每年都舉辦一些活動，維繫大家的情誼。

求主保佑我們，賜給我們平安！

樂鋒會的點滴

陳詠梅

我生長在一個很有濃厚宗教氣氛的天主教村—太古樓，那裡有一座教堂、學校、神父住所（又名神父上高）和一座修女住所。小時，大部份的兒童都就讀聖華小學，而我和兄長以及妹妹也不例外。薄扶林村及礦線灣的兒童也到聖華小學上課，每星期上課五天半，有長短週，每天上課前都在操場祈禱才回課室上堂。

巴黎外方傳教女修會的修女（德姑娘、孟姑娘、郭姑娘等等）及明之剛神父成立了「樂鋒會」。每逢週日都有集會，主要對象是區內外及就讀聖華小學的學生，給他們在課餘時參加一些課外活動，使那些兒童能夠聚集一起培育宗教信仰，學會守紀律，做勞作及唱遊等。有時也會出外參觀或作些戶外活動，使他／她們有機會發揮自己的領導才能，亦可藉這個聚會使未認識天主的兒童能夠多了解及接觸天主教信仰。我最難忘的是每逢暑假「樂鋒會」的修女們會舉辦為期一星期的宿營活動，地點是南丫島—露德聖母學校。修女們和領袖（區內一些青年男女）預備很多豐富而有益身心的活動和節目給參加者。每天清早明神父會開彌撒，彌撒完畢每一組組員都必須要負責一些工作，例如清潔及打掃營舍，預備早餐和清洗食具等，午飯及晚飯也需要幫忙。而每天有不同節目如行山、游泳、自由活動、唱遊、晚會、營火會、天才表演及分組比賽等，節目十分豐富及多采多姿。在這個活動裡可以使每一個參加者都能學會照顧自己，因為每人都要自己洗衣服、整理個人必須品以及照顧自己及他／她人，這是個磨練自己、建立自信及與人溝通的最好機會。雖然是短短的一個星期，它使我領略到群體生活、與人溝通的重要性及互相照顧和幫助的精神。在這裡我衷心感謝修女和明神父成立「樂鋒會」，使我們獲益良多。

還記得在一九七一年八月暑假，「樂鋒會」修女們和明神父舉辦了南丫島宿營。出發那天剛剛（颱風露絲）襲港懸掛一號風球，在明神父和修女帶領下，我們浩浩蕩蕩到了港外線碼頭準備上船，不久船公司負責人向明神父說天文台已懸掛三號風球，他們請神父盡快決定是否上船往南丫島。當時風浪不算太大，經明神父、修女考慮後終於決定起行，當時大概有一百多人，上船後不久風浪越來越大，有很多兒童在哭、感到不適、驚慌及嘔吐等，場面十分混亂。但明神父還是那麼鎮定、不慌不忙地安慰小朋友，到了南丫島碼頭，風雨很大，領袖們便幫助參加者盡快離開碼頭，趕上露德聖母學校，當我回首望向海面時才感覺到非常恐怖，因那艘輪船左搖右擺，看起來船身傾側到差點兒和

水平線相連，十分可怕。到了學校大家便忙著通知參加者的家人報平安。那晚掛了十號風球，門窗都入水，很多小朋友在哭及害怕，但在神父和修女的安慰下，大家都平靜地安然渡過這一晚。翌日，天氣好轉，餘下來的幾天大家都玩得很開心，「樂鋒會」給我帶來一個美好及難忘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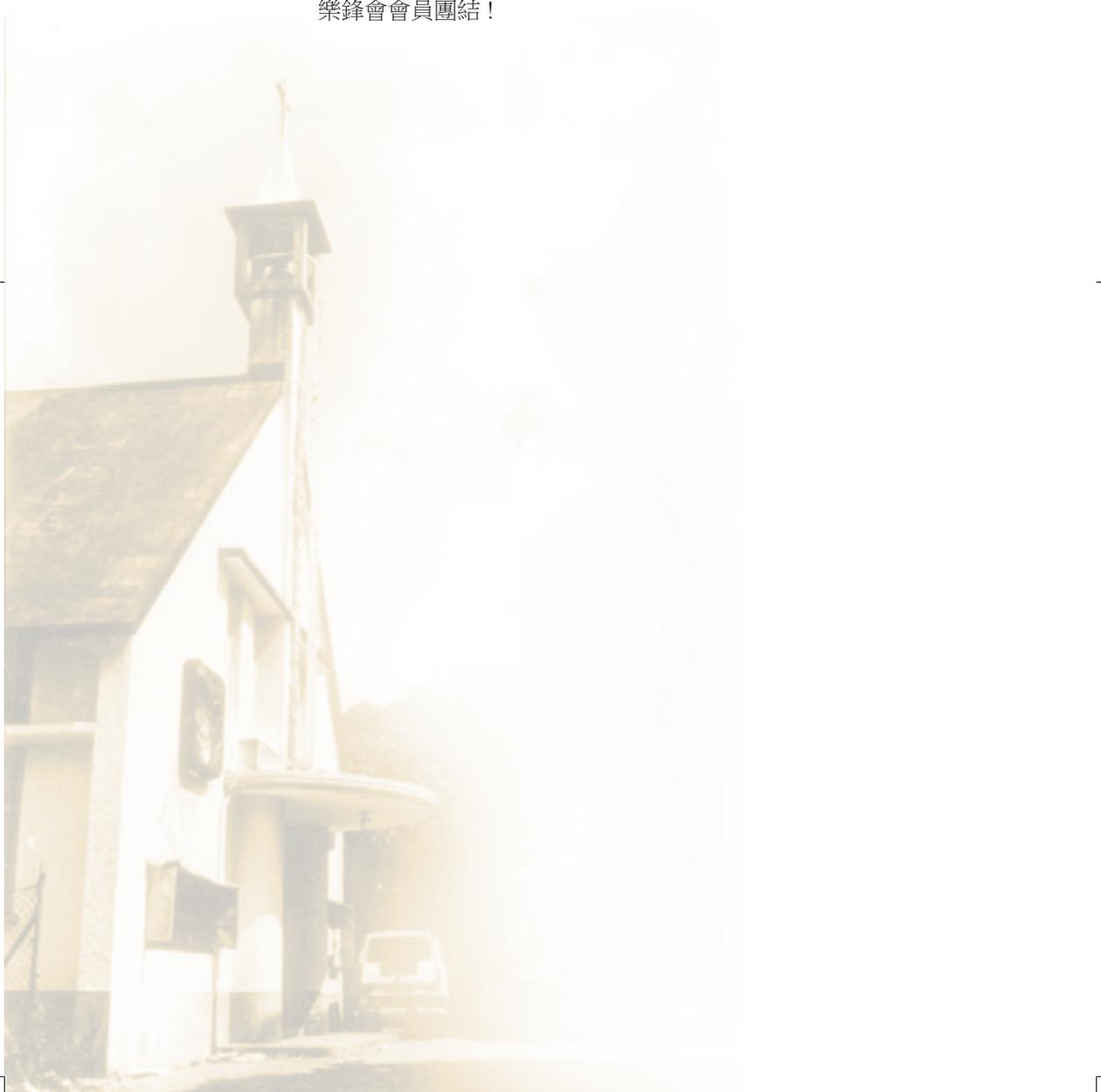
62

「樂鋒會」的會歌：「奮起！奮起！環繞大街小巷的人們都聽見我們的歌聲，我們唱著新的希望，我們是樂鋒會會員。」

樂鋒會會員團結！

樂鋒會會員團結！

樂鋒會會員團結！



常常祈禱，事事感恩

梁素玲

太古樓 — 一個我小時候居住的小村莊、一個全是天主教教徒的宗教村，因此除了讀書之外，參加善會就是我們的課外活動；由童年時開始參加聖嬰會、樂鋒會、直至青少年時的聖母軍，都令我留下深刻的回憶。回想起在聖母軍的日子，大家一起在聖母山掃樹葉，在輔祭房為聖爵打蠟，在神父辦公室做麵餅（未祝聖之聖體）、當年的麵餅是由我們每星期新鮮製造的，彌撒中讀經，售賣聖物，探訪弱智兒童中心及老人院舍等。

猶記得當年已經有公教報訂閱服務，我要每個星期五晚派發到他們家中，其實派往第一、二座是沒有問題的，但每次派至新屋（即第三座）時，問題就來了，新屋實在太多惡犬，每次我都要左閃右避，在梯級間上上落落或者要從後門轉一個大圈才可到另一個門牌派發。克服困難、完成工作，此經驗令我終身受用。

探訪醫院也是聖母軍的工作，因此我有機會跟隨明之剛神父到大口環醫院探訪。記得第一次踏入病房，所有病人都急不及待要跟明神父談天，從他們臉上的笑容、眼中的信任來看，可見明神父深受教內外人士尊敬。我親眼目睹他站在病床旁細心、關懷地問候病者，這份愛心令我留下深刻印象。還記得有一次當我們剛踏入病房，有一個病人指著另一張床說：「他走了。」當時我呆著哭了，明神父輕按著我的頭說：「為他祈禱吧！天主聽到的！」及後明神父被調派到聖神修院，在緊接下來的幾位神父的帶領下，我們更加聯同華富村及西環的教友一起探訪；繼續宣揚天主的愛。

太古樓 — 一個團結的大家庭。我們一起參與聖誕節及復活節的宗教禮儀，一起慶祝農曆新年及中秋節等傳統節日，一起為新生嬰兒領洗而歡欣，一起為亡者的離去而哀痛。記得我們除了要參與安所彌撒外，更要連續一個星期的晚上聚集在亡者家中，一起誦念「煉獄禱文」，往後的每個星期還要誦念一遍，直至第七個星期才完結。為煉靈祈禱，安息主懷！

當想起太古樓，便會想起很多人和事，想起我們慈祥的爺爺明之剛神父。一件黑布長衫、一支煙斗、一雙很大的手、臉上的微笑、每一句留給我們的說話，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受他深深影響著。我已經習慣每天祈禱，念玫瑰經，因為我堅信明神父的話 — 「信賴天主，常常祈禱，事事感恩，天主定會開心！」

仁愛在我心

明神父與太古樓

口述：符多祿 / 訪問及撰文：鮑慧賢

自從明之剛神父從東莞來港、於一九五二年繼任韓神父出任露德聖母堂堂區司鐸，就成為符多祿銘記在心的仁愛師長。

不嫌骯髒，親自通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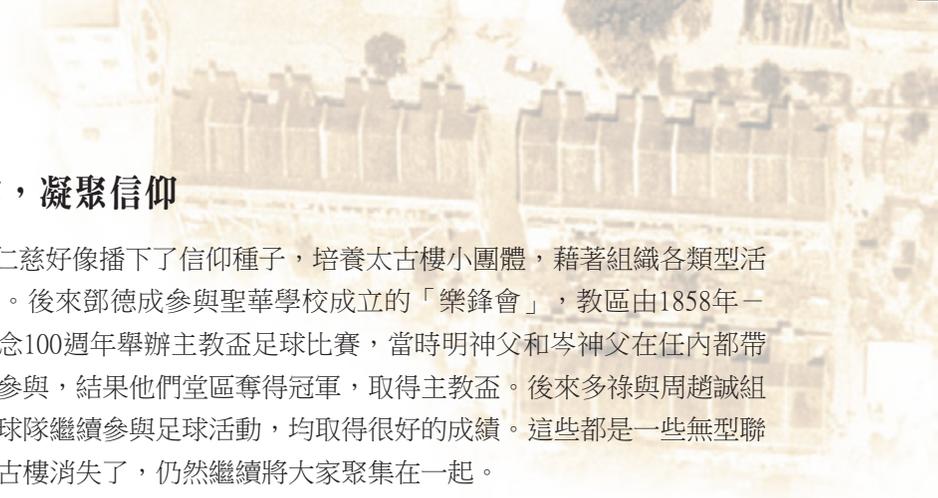
印象中的明神父待「太古樓人」慈愛猶如家長，每逢老人家生病必定親到他們家慰問甚至守夜照顧，也特別疼錫小孩子。多祿憶述童年片段，道：「明神父不單照顧我生病的媽媽，我十歲時家貧只睡舊帆布床、蓋一張薄毛氈。神父看到立即說這樣不行！天冷小孩子睡覺吹了風、很易冷病！他堅持拿張厚氈給我保暖，更親自蓋在我身上。」

多祿又記起十多歲時，太古樓的住戶將天井放柴的地方改裝為廁所，從家中接駁一條管排出污物到公共溝渠。當年這樣的環境其實很不合乎衛生，坑渠更會時常淤塞。這時明神父竟然不怕污穢惡臭，親自「下渠」清理齊腰的廢物。多祿道：「我們一班好奇圍觀的小朋友不知怎樣幫忙，神父卻說這很骯髒，叫我們快去玩、由他自己一人通渠。相信沒有神父能做到像他一樣，對大家像子女般疼惜。」

孜孜不倦，捨己助人

太古樓本身是教會租用給八角樓（納匝肋印書館）職員的宿舍，多祿跟太古樓很多家庭一樣，父親在印書館做印刷鉛鑄，自幼信奉天主教。根據粗略統計，太古樓的登記戶口約三百多，都住在三排共大約四十八間房子中。明神父平日除了為大家開彌撒及上門探訪有需要的住民，也做大量的服務工作。多祿記得，明神父開一輛法國外方傳教會給他用的「小福士」，駛到大口環、瑪麗醫院四處探望病人。多祿相信，明神父孜孜不倦、忘我助人的精神，啟發後來聖母軍的成立，帶領更多人主動關懷病患者。

多祿與太古樓人心目中的明神父，更常常為了幫助別人傾盡自己所有。多祿記得曾親眼目睹明神父掏盡口袋的五塊錢接濟一個向他求助的人。無論遇上什麼事，明神父也從未曾動怒罵人。



處世精神，凝聚信仰

他的仁慈好像播下了信仰種子，培養太古樓小團體，藉著組織各類型活動不斷成長。後來鄧德成參與聖華學校成立的「樂鋒會」，教區由1858年—1958年為紀念100週年舉辦主教盃足球比賽，當時明神父和岑神父在任內都帶領教友積極參與，結果他們堂區奪得冠軍，取得主教盃。後來多祿與周趙誠組織青年會足球隊繼續參與足球活動，均取得很好的成績。這些都是一些無型聯繫，即使太古樓消失了，仍然繼續將大家聚集在一起。

大至團體，小至個人，大家早已將明神父的言行視為成長處世的模範。多祿道：「我從神父學到比我小的都是弟妹，所以我從不欺負或戲弄他們，反而處處幫助維護。路見不平，對所有弱小的關愛，是明神父對我的影響。我也從明神父身上學習到一份人與人之間相處的耐心，使我們太古樓與附近一帶草寮與薄扶林村的村民也能夠融洽共處，即使日常生活有磨擦也忍耐，本著待人和氣的心好好溝通，一起解決。」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口述：何桑培 / 訪問及撰文：周嘉琪

66

現定居加拿大溫哥華的何桑培，閒時回港都會探望一班太古樓街坊、聚聚舊。說到太古樓，桑培叔便滔滔不絕起來。還未搬進太古樓以前，桑培叔已經常出入這個地方，因為他在戰前約1938年起便就讀聖若瑟女校（編者按：他是女校男生），即後來的聖華學校，當時教師都是來自聖保祿女修會的修女。「從小便聽修女分享聖經、道理，搬進太古樓以後便順其自然地信了教。」桑培叔回想說。於一九四一年搬進太古樓的他，從太古樓這個信仰村的氛圍下，便漸漸多參與堂區的服務、加入善會，例如是聖母軍和互助社，後來更變得十分積極，同時跟明之剛神父的關係更加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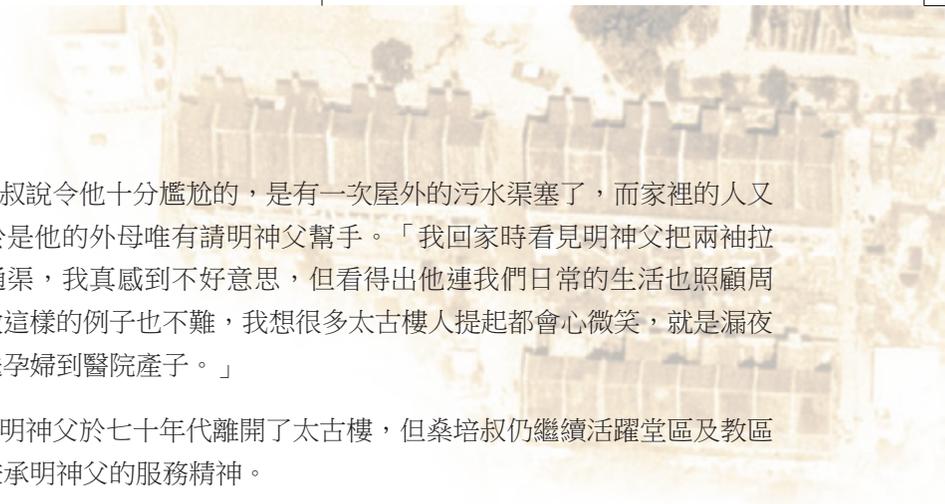
「明神父的德行和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他的教導我還記憶猶新。在善會裡工作，跟他接觸很多，有好幾次的探訪與義工活動，他都樹立很好的榜樣。」

桑培叔猶記得有一次到南丫島探訪貧困的人，當時有一位老婦人病得厲害，明神父親自幫手抬著婦人從她的家走好幾條村、再乘船出香港醫治。他親力親為的精神很值得我們學習。

又一次，桑培叔親眼目睹明神父那份不捨棄窮人的愛，讓他大為震撼：「那時我開車送明神父回太古樓住所，那一刻村內正有兩位等候他幫忙的人，一位是穿著光鮮、富貴的男子，而另一位是等候施捨的老婦人。明神父看到這個情況，在沒有考慮的情況下，先走到老婦人跟前，嚷著請她等一等，然後立即走到有錢人前，同樣請他等等，便回到婦人那處，盡力把身上的錢都掏出來，最後他身上雖然只有五元，也全部給了那婦人，並給她米糧和衣服。」

桑培叔說明神父另一次捨己為人的表現，是發生在癲瘋病村裡的。當時癲瘋病非常流行，而大口環當時設有癲瘋病村，明神父會時常探望那裡的病人。桑培叔說：「明神父不但沒有嫌棄他們，還親自為他們洗腳，就像耶穌為十二門徒洗腳一樣，表現愛人如己的精神。」

而桑培叔又認為明神父不理自己的身世，總願意先幫人後才考慮自己。「記得有一個夏天他要回法國探親，於是我們便給他買了新衣服，好讓他光光鮮鮮的回家。要不是聖堂彈琴的翰伯告訴我們，也不知道原來明神父平常穿的內衣很多都破舊了，但從來不提，也不刻意更換新的。」



桑培叔說令他十分尷尬的，是有一次屋外的污水渠塞了，而家裡的人又上了班，於是他的外母唯有請明神父幫手。「我回家時看見明神父把兩袖拉高，動手通渠，我真感到不好意思，但看得出他連我們日常的生活也照顧周到。要再數這樣的例子也不難，我想很多太古樓人提起都會心微笑，就是漏夜請他開車送孕婦到醫院產子。」

雖然明神父於七十年代離開了太古樓，但桑培叔仍繼續活躍堂區及教區的活動，秉承明神父的服務精神。

從天堂來的善牧

明神父與我的童年

口述：陳佩珍 / 訪問及撰文：鮑慧賢

68

家中共十兄弟姐妹、排行最大、七弟弟為陳志明副主教的陳佩珍，視明之剛神父為愉快童年時代的信仰牧者。

親和關愛，助人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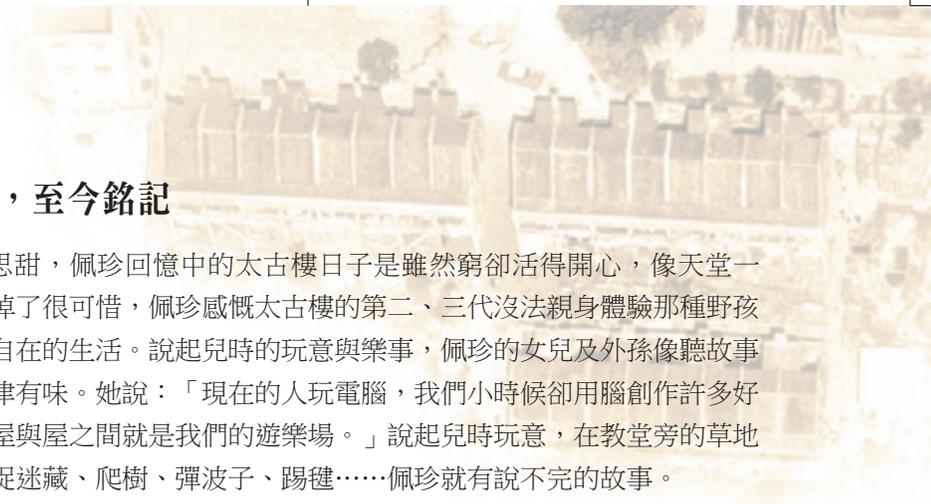
來自公教家庭，出生三朝就受洗禮的她憶起當年認識明之剛神父的緣起，說道：「當年韓神父離開我們堂區之後就由明神父接替。第一印象是這位年輕神父相當之和藹可親，尤其喜歡小朋友。他不但慈愛關懷小孩子，也特別照顧老人家。」

佩珍記憶中明神父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因此比上一任的韓神父多一份難以形容的親切感。「韓神父對我們小孩子是嚴格一些，對成年人嚴禁賭博。明神父則比較容易溝通。」親力親為亦是明神父的本色，太古樓哪一家有什麼困難或需要幫助，哪裡就有明神父的身影。

仗義助學，循循善牧

至於佩珍一家與明神父的淵源，更是令人難忘。弟弟今天成為副主教，她深深感謝當年明神父這位牧者的帶領。此外，佩珍父親獨力工作維持一家多口的生計，明神父為了讓窮困家庭的孩子有機會接受教育，親自負擔起佩珍聖華小學每月兩塊半的學費，免得佩珍因家境問題退學。明神父更同時資助堂區其他孩子上學，寧可自己節衣縮食，足見他滿溢的愛心。

佩珍一家不少親戚是神職人員，因太公在納匝肋印書館工作而自幼居於太古樓。想起從前的日子，她記得自己的家住最多人，後來叔叔結婚成家立室也搬來一起住，人丁興旺。今天太古樓不在了，太古樓之友卻依然時不時將大家聚首一堂。佩珍道：「其他堂區的朋友都問我：為什麼你們的感情維繫得這樣好？」



童年點滴，至今銘記

憶苦思甜，佩珍回憶中的太古樓日子是雖然窮卻活得開心，像天堂一樣。地方拆掉了很可惜，佩珍感慨太古樓的第二、三代沒法親身體驗那種野孩子一樣自由自在的生活。說起兒時的玩意與樂事，佩珍的女兒及外孫像聽故事一樣聽得津津有味。她說：「現在的人玩電腦，我們小時候卻用腦創作許多好玩的遊戲，屋與屋之間就是我們的遊樂場。」說起兒時玩意，在教堂旁的草地打球、晚上捉迷藏、爬樹、彈波子、踢毽……佩珍就有說不完的故事。

自小受洗，佩珍與太古樓小孩的信仰隨著步參加慕道班、聖詠團而日漸成長，明神父的教誨依然常在腦海，尤其他的謙遜和愛心。她道：「他就像一位來到我們生活的聖人，仿似耶穌一樣。」記憶中的身高六呎的明神父永遠黑長衫一道，手持煙斗滿面笑容。太古樓培養下來的信仰基礎，其後在聖母軍、其他堂區甚至下一代都得以繼續茁壯，令佩珍常懷感恩。

我敬愛的明之剛神父

馬兆桂

70

當我收到太古樓之友籌委會邀請我分享明之剛神父生前的生活點滴之後，令我深感惶恐，因籌委或太古樓之友內有很多長輩比我更有經驗分享明神父的往事；憂慮未能勝任將明神父的珍貴生活點滴一一表露，但為了對明神父的懷念及致敬，將我對明神父的深刻印象及回憶，樂意與大家分享：-

當我八、九歲任輔祭時，明神父給我的印象是一個被煙斗薰黃鬚鬚的萬能博士。每天彌撒後，他會駕駛他的福士甲蟲車周圍探訪教友和病者；他還會修理自己甲蟲車、整理花園等。週六我們〔輔祭〕會跟隨他到黃竹坑瑪利灣學校舉行彌撒，當時這便成為我們的好節目，因可以坐他的甲蟲車。

逢主日在太古樓舉行彌撒之後，他會長途跋涉到西環乘坐街渡到南丫島傳教。當時並沒有固定地方舉行彌撒，只是在教友的家內舉行。有時彌撒後教友們會熱情地招呼明神父和輔祭到他們家中吃飯，還「割雞殺鴨」非常豐富；我們是非常樂意及渴望跟隨的，因當時一般家庭並不富裕，難得「有餐好嘢食」；而我因次數多了，還得了一個花名「肥佬桂」添！

因南丫島沒有固定地方舉行彌撒，聰慧的明神父找到一個小山崗，興建了一所只有兩個課室的小平房來作學校，讓當地的小孩子有機會接受教育，但因身處山崗，沒有自來水供應，明神父有見及此，和附近的一位教友商議好，由他家裏的井引水到學校，由明神父及年長輔祭們的帶領之下，我們由西環運載喉通及一切用具到山崗，開始這項非一般的工程，在明神父的汗水及大家的努力之下，用了一個暑假的時間便完成了，而這就是南丫島露德聖母學校的前身了。

明神父離開自己的父母，飄洋過海，隻身來到語言不同及文化背景不同的香港傳教，還細心觀察到當時傳教區—南丫島的實際需要，建設基本的設施讓當地居民接受教育，處事親力親為、任勞任怨。在天主的帶領下，有幸認識到這位慈祥的長者，在他身上讓我看到基督的臨在，可惜當日的我蠢鈍無知，未能受聖神的恩賜，跟隨明神父獻身侍主，但他的獻身侍主的精神已根深蒂固的刻在我的心內，我會持守這信仰，努力侍主愛人，傳揚福音，讓天主的愛福佑普世萬民。

明之剛神父對我的影響

口述：盧麗霞 / 撰文：謝桂馨

今天的我懂得和人分享，珍惜食物，熱心侍主等，都是受了一位我敬仰的人影響，他就是明之剛神父。

回想1952年春天，我在鋼線灣（我在國內來港的落腳點）遇見了在那裡傳道的他。當時他給我的印象是個奇怪的人，因他身形高大和蓄了鬍子。因為他，我們一家接受了主的揀選，學習道理，並於同年12月24日領洗，加入了主的大家庭。

我們一家在1954年搬往太古樓居住，正式開始了教友生活，我這麼說是因為那裡有座教堂，給了我機會善盡教友本份。就因為這樣，我接觸明神父的機會多了，在相處的時間不單消滅了我對他的那份恐懼，更加添了我對他的認識和了解。原來，他是個很有愛心，樂於助人的神父。很多時，他拿出口袋裏最後的一分一毫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對於痲瘋者的不介懷及獻出關愛精神更值得我們仿效。他在講道時更訓勉我們要懂得寬恕，做事要無愧於心及要遠離魔鬼。

身為露德聖母堂的主任司鐸，明神父除了傳揚福音外，也為貧困的教友在各方面給予資助，他聯絡了一些慈善團體給我們發放救濟品及贈醫施藥。平安夜更播放西方電影，讓我們在參與子夜彌撒前有個歡樂的聚會，在聖誕節期間又為小朋友舉辦聯歡會，使他們擁有快樂的童年回憶。那時，生活平淡的小孩，竟然有機會往銀鑛灣宿營，明神父真是居功不少，他亦成立了青年會，給予青年們參與堂區以外的表演機會，擴闊了大家的眼界。

我們這群教友不只懂接受施予，亦會在行動上作出回應。大節日一到，大家便協助清潔教堂和聖母山。亦有教友參加了詩歌班，用歌聲去讚頌上主，參加聖母軍的兄弟姊妹便協助各種堂區內的工作。

今後，我亦會繼續善盡教友責任，事事依賴上主，凡事感恩，時常祈禱，特別是為在煉獄中的靈魂。信仰使我堅強，亦常蒙主恩。

最後，我亦為能在太古樓生活，成長及認識到一班到現時還有聯繫的朋友而謝恩。那時，大家確實過着不覺窮困但快樂的日子，這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的難忘生活方式，我當然不會把它忘記！感謝天主！

滿臉笑容

口述：梁有伴 / 訪問及撰文：周嘉琪

72

婚後便搬離太古樓的梁有伴，嘴裡總說對太古樓的往事已忘卻得七七八八，但是說著說著，昔日的快樂片斷又慢慢地重組起來。

「我是聖華學校第二屆畢業生，那時大概是五十年代吧。」梁有伴牢牢地找緊記憶說：「讀書時代我參加了聖母軍，有機會跟著明之剛神父到處探訪、傳揚福音。探訪中見到不少非教友，他們也都願意信奉主，很令人鼓舞。」

因為聖母軍的緣故，有伴跟明神父的接觸多了，印象中他是個常帶著笑容的快樂人：「每次看見他都是笑臉迎人的，印象中他大公無私。還記得有一年爸爸病了，需要用錢。爸爸當時是在納匝肋印書館工作，在沒有其他辦法下，我們去了找明神父。他聽到我們的需要，沒有一點推辭便立即把錢給我們，我們一家也十分感激。」

除此以外，太古樓給有伴的回憶都是美好的，她說：「小時候最開心就是聖誕節，參與出遊，參加子夜彌撒，還有大伙兒到聖堂外的空地看露天電影。」有伴嘴角掀起微笑，趕快地說，彷彿回憶會再一次匆匆的溜走：「彌撒過後，便回家吃宵夜，那時家家戶戶都一早準備好食物，吃得肚子暖暖飽飽的。」

明神父頌

謝桂馨

明 白事理樂助人
之 剛神父顯愛心
剛 毅不屈傳道去
神 恩引導播種人
父 慈容貌繫眾心

明之剛神父 — 我的模範

謝桂賢

「瑪利亞把一切默存於心，反覆思量。」（路2：19）總覺得慈祥的明之剛神父就像聖母瑪利亞一樣，常帶著微笑，穿著那清潔但殘舊的白色工作服，默默地打理他的園圃，其中有開得燦爛的向日葵，驕傲地朝著太陽，展露著笑容；每天晚禱後明神父愛坐在辦公室裡，手拿煙斗，吸一口煙，默默地細心聆聽公公婆婆閒話家常。他雖說話不多，卻為我們立下了好榜樣，成為我們的典範。

明之剛神父已離開我們三十年，現讓我分享他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 F - Friendly (友善的)
- R - Respectable (受尊敬的)
- R - Resourceful (機智的)
- E - Efficient (效率高的)
- N - Noble (高尚的)
- E - Energetic (精力充沛的)
- C - Christian (有基督精神的)
- H - Holy, Humble, Hard-working, Humorous & Helpful
- E - Excellent (傑出的)
- V - Valuable (珍貴的)
- A - Admirable (可欽佩的)
- L - Learned (博學的)
- I - Irresistible (無法抗拒的)
- E - Environmental (環保的)
- R - Responsible (負責任的)

「尋找明之剛神父的足跡」

法國朝聖之旅

謝麗蓮

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教友

74

香港露德聖母堂及太古樓之友舉辦了一個名為「尋找明之剛神父的足跡」法國朝聖之旅，出發前三個月，朝聖之旅顧問陳志明副主教為我們舉行三次聚會，亦邀請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龐樂培神父講述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歷史，精神和貢獻。

明之剛神父出生於法國博普雷歐一個農民家庭，他在1935年加入巴黎外方傳教會，1942年晉鐸，1946年到中國，獲派駐廣州石室教堂和石龍癲瘋病院工作，1952年來港，服務於薄扶林太古樓村內的露德聖母堂，長達19年之久，其間他深受村民高度讚揚，1971年，明神父出任香港仔聖神修院神師時，更深受學生愛戴，堪稱桃李滿門，1980年，他出任西環聖母玫瑰堂主任司鐸。其時他雖然已屆古稀之年，但他仍然致力於關懷社會的服務。1981年4月，明神父剛休假回法國，途經泰國，本擬探訪當地難民，豈料卻遇上車禍而逝世，終年72歲，遺體運返香港，安葬於跑馬地天主教墳場。

我們的團員太古樓之友，都認識明神父，他們深深感受到他的愛，和他的無私奉獻。他全心全意地服務教友，默默耕耘，不問收獲的基督精神使太古樓之友的家庭關係良好，他們互相幫助和接納，活得很快樂。他亦曾收養孤兒和照顧香港的癲瘋病人。遇上節日時，他亦安排聯歡會，話劇或電影等，完全融入中國人的社會，使太古樓之友視教堂是他們的家，因此清潔教堂也是他們的責任。每個晚上，他們一起做晚課，宗教氣氛十分濃厚。明神父喜歡耕種，尤其是種木瓜，那當然會與教友一同分享，使他們口福不淺，共享天主的愛。

我們團員共分為瑪竇、馬爾谷、路加和約望四組，陳副主教鼓勵各組組員於出發前熟讀自己組別的聖經部份，多祈禱，好好準備這次朝聖，他亦於五月二十四日晚上前來送行，祝福我們，鼓勵我們要為中國教會祈禱，亦提醒我們是朝聖者，不是遊客的身份。

今次行程的首站是露德，我們朝聖團的神師葉定國神父認為是一個最好的安排，因為在露德的首三天，可以說是一個小避靜，讓我們有充分的祈禱時刻去洗滌心靈，更可養足精神去其他地方朝聖。在苦路聖山上拜苦路的時候，

葉神父提醒我們，苦路聖山的苦像是按人的比例而造成的，我們拜苦路時，不妨留意苦像的形態和眼神，好讓我們能投入當時耶穌的心神，亦可淨化我們的心靈，多做補贖。



朝聖團在苦路聖山上拜苦路

當年聖母引領聖女伯爾納德到泉水，今天聖女伯爾納德亦領我們到露德去浸聖水，那一刻的交托，那一刻的信德，真是可以洗滌心靈，使靈性生活成長。我們更應該有感激之心，讓自己能處身於聖母無玷始胎大殿中，四周的玻璃窗畫展露聖母顯現給聖女聖伯爾納德的情況，提醒我們聖母要求人們懺悔及為罪人改過祈禱。玫瑰大殿內的15端玫瑰經奧蹟，加深我們對誦念玫瑰經的體會，默想聖母與基督的一生，分享祂的平安，認清自我和信仰的使命。



葉定國神父於聖母岩舉行感恩祭

在露德，病人與健康的人一起參與聖體與燭光巡遊，沿途誦唱聖詠、誦唸玫瑰經，萬人聚集在一起為世界祈禱，場面宏偉兼感人，使我們感覺到處身於教會的大家庭中，互相燃點信仰心火，我們更認識到要不遺餘力地傳揚福音，以愛德的行為作見証。

聖伯爾納德是一個磨坊工人的女兒，她是一位牧羊女和女傭，但聖母瑪利亞於1858年2月11日至7月16日期間曾18次顯現給她，聖母透露了她是「始胎無玷者」，聖女曾說過，她之所以被聖母揀選，是因為她貧窮和無知。

我們參觀了「磨坊」（這是聖伯爾納德出生的地方）和「黑牢」（她十多歲時的居所），當中都可以感覺到她家庭的困境，聖女的單純，對聖母的信任和交托，提醒我們要全心全意去愛天主，不求己益，放下私慾，天主的愛，時時刻刻都會臨在我們的生活中。

我們到達里修 — 聖女小德蘭的故鄉，參觀加爾默羅隱修院。從錄影帶中，我們看見隱修女們活潑開心的笑容，明白她們可以過著遠離物慾的生活，而仍然深愛天主。我們跪在聖女聖髑旁祈禱，體會她的恩寵，反省我們與天主的關係。

聖女小德蘭大教堂座落於山上，牆上的壁畫提示我們，信德和愛德是最重要的，小德蘭右手聖髑（她是用右手記錄她的靈心小史）和她父母的聖髑同放於地洞聖堂內；小德蘭父母的聖髑亦放在香港聖德肋撒堂，有形的聖髑提醒我們聖人在世的芳表，小德蘭父母能成為真福，並不是其女兒是大聖人，而是他們的教導和培育，才是小德蘭踏上成聖之路的關鍵。



安放在加爾默羅隱修院的聖女小德蘭聖髑

我們在小德蘭的故居，看見她的遺物如：床、衣櫃、玩具、餐具、頭髮和衣服等等，可以感受到她是父親的愛女，她是在愛的環境中成長的。



聖彌額爾山

公元708年，主教在聖彌額爾山上建築了聖彌額爾修道院，從此，此地成為重要朝聖之地，我們參觀了這個偉大工程，可惜今天只有六位隱修士居於此。

五月三十日是我們這次朝聖之旅最重要的日子，我們到達博普雷歐，一個我們從未聽過的地方，這是明之剛神父的家鄉。到達時，我們遠遠看見歡迎我們的海報，教堂亦鳴鐘以表歡迎。



門上的歡迎海報

七十多位歡迎人士中包括明神父的弟弟 Alphonse、弟婦、姪兒、姪女、姪孫、曾姪孫、神父、教友、市長、市政廳官員和七位從中國來法國學習的女初學生，他們笑容滿面，拍掌歡迎。在歡迎會上，戴唯微神父（巴黎外方傳教會副會長，曾在香港教區服務，亦是我們當地顧問）替我們翻譯。



明之剛神父的家人

我們的團長陳忠明先生說明我們來臨的目的，是想明瞭明之剛神父成長的環境和讓人認識明神父和他的傳教精神與德行。Alphonse 說歡迎詞時，眼帶淚光，場面感



明之剛神父的家人及當地教友歡迎朝聖團到訪

動，令四周的人忍不住想流眼淚，我們的團友都很感動地上前擁抱他。其後 St. Martin's Church 主任司鐸介紹他們教堂的歷史。從幻燈片中我們得悉明神父龐大家族的一些生活片段。

我們參觀明之剛神父家族的農場（le Chataignier），這是明神父出生、成長和工作的地方。現今已沒有人居住，只見一大片荒廢的田野，長滿野草和破舊的石屋，但可以想像明神父處於這一大片廣闊農田中，與天主相遇，肯定自己的傳



明之剛神父家族的農場 Le Chataignier



1957年的明之剛神父和他的兄弟及妹妹



明之剛神父的弟弟在看照片

教聖召。

透過接觸明神父的家人，我們得悉明神父的妹妹是修女，姪兒也是傳教士。Alphonse 告訴我們，明神父很喜歡聖人de Monfort 主教的德行，深受他的影響。那時候博普雷歐的青年人很遵守

教規，喜歡做神父，修士和修女，特別喜愛傳教士。入修院的年齡通常是十多歲，但明之剛神父於二十四歲時才進入修院，是屬於高齡修生。其實他的父母

從來沒有反對過他做傳教士，只是他覺得他有責任分擔父母的工作，他認為打理農場是他應有的責任。他於二十歲時當兵，完成他對國家的責任才進入修院，可知他是一位孝順和有責任感的兒子，亦是對國家有承擔的人。



博普雷歐聖伯多祿堂外貌

明神父在1942至46年服務於博普雷歐聖伯多祿堂為副本堂，現在有些教友還沒有忘記他呢！他們告訴我們他是一位開朗活潑的人，喜歡踢球和游泳，亦曾在危險時救過遇溺的青年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盡力保護青年教友。



博普雷歐市長接待朝聖團

博普雷歐的教會和市長很重視我們朝聖團的到訪，每當我們到達教堂參與彌撒時，教堂都鳴鐘，Alphonse 都會奉獻一個世界地圖膠球於祭台前，祭台上亦掛上明神父的大海報，除了明神父的家人，教友和七位中國女初



法國當地報章 Courrier de l'Ouest 及 Ouest France 均有報導朝聖團到訪



葉定國神父、戴唯微神父與 St. Martin's Church 主任及助理主任司鐸在 St. Martin's Church 共祭

學生，市長和市政廳官員亦參與彌撒。

市長亦於翌日聯同市政廳官員帶領我們參觀舊城區和城堡外

觀，沿途亦有記者隨行。當地報紙亦刊登我們的照片和報導我們的到訪。市長於市政廳設歡迎會，表達他很珍惜和重視這次與中國教友的相聚，強調法國教會的重要性和要為世界和平合作；他更承認明之剛神父是這方面的重要橋樑。



朝聖團成員與當地教友一同參與感恩祭

我們離開博普雷歐時，興奮的心情還未能立刻平伏就到達沙特爾聖母大教堂。我們很幸運，亦受到天主

的眷顧，因為我們參觀巴黎聖母院時，剛巧遇上每月舉行一次的刺冠朝拜；於聖心教堂時，又遇上明恭聖體；於聖母顯靈聖牌教堂，更遇上神父舉行感恩祭。

前太古樓聖華學校老師 — 郭修女，專程來到聖母顯靈聖牌教堂與太古樓之友會合，真是他鄉遇故知呢！參觀巴黎外方傳教會時，總會長接見我們，帶領我們參觀會院。得悉他們的傳教士遍達全世界，在香港的服務也很偉大。午餐時他們還為我們團員舉行生日會呢！



太古樓之友與郭修女於巴黎相遇

今次朝聖，我們除了認識香港的明之剛神父，亦認識到法國的明之剛神父，透過他的親戚和當地教友的分享中，我們知道明神父是一個言行一致的人，他無論處於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他都是盡心為教友服務，透過服務，他影響教友，使教友更接近天主，他按照天主旨意生活及工作，活出天主之國的神父。我們應該感謝天主，因為他給了香港一個具有聖人特質的神父。

跋

80

研究太古樓，把它作為介紹香港歷史遺跡的項目，是一個冒險，因為我們要向公眾介紹一樣已經不存在的東西。但是，隨著研究的開展，我們發覺原來是可行的，只要發揮一點想像力，配合足夠的動機及一些正確資料，就可以慢慢填補零碎的歷史脈絡，重現一幅不完整但漸見清晰的圖畫。今次的研究有四方面值得我們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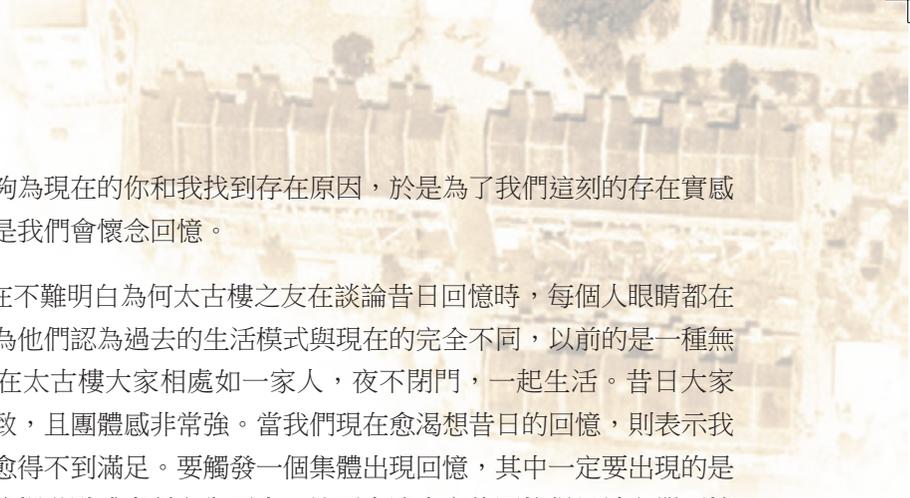
首先，文化由古至今不停地交流，每次交流都會帶來新事物及新的挑戰。無論科技怎樣發展，人一直以來都是容易受環境影響的生物。早陣子一個颱風已經足夠影響我們的心情，市民由期待颱風為他們帶來多一天假期，到失望看著颱風離開香港。人的情緒更隨時會因為天氣、海水、空氣等而受波動。但正因為人是容易受影響，文化才可以交流、結合、創新。

今天，我們正處於一個跨國的、全球性的一個世界，國與國之間互相影響。文化、文明的交流在今天就像風一樣由東向西、又西向東，生生不息。事實上，隨著科技的進步，特別是訊息的無阻礙傳遞，現今東、西地域上的概念變得愈來愈模糊，這亦印證了文化交流之頻密。

太古樓是一個由東、西文化交流甚至互為影響下而生的產物。剛剛有香港的天主教徒遠赴法國尋找明之剛神父的家鄉，然而昔日卻是明神父隻身從法國來到香港傳教，這就是交流。研究太古樓可以幫助我們比較今、昔生活之不同，從而反思每個人應該有的交流精神。

其次，太古樓的研究讓我們學會居安思危，隨時面對新的生活模式的改變。太古樓以及整個薄扶林區曾面對很多不同的經濟轉型：由農業、漁業變成印刷業、畜牧業、各種小型工業，變成今天的一個高級私人住宅區。香港現在正從服務業中慢慢改變，經濟開始出現結構性調整。誠然，這次研究我們可以用一個懷緬的角度看待太古樓，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透過觀察昔日的人與事學會面對突如其來的生活改變。

再其次，透過太古樓的研究，我們可以反思集體回憶的意義。人自然地會對回憶作出選擇，同一件事有些人會忘記，有些人則會銘記。過程中，人會有目的地取捨回憶。有時甚至會參考現在身處的環境而詮釋過去的回憶。例如一些相似的童年經歷可以同時出現在社會上成功人士與失敗人士身上，而最後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詮釋方向。回憶更會從時間而改變。但是，不論回憶是否模



糊，回憶總能夠為現在的你和我找到存在原因，於是為了我們這刻的存在實感得以延續，於是我們會懷念回憶。

我們現在不難明白為何太古樓之友在談論昔日回憶時，每個人眼睛都在發亮。這是因為他們認為過去的生活模式與現在的完全不同，以前的是一種無拘束的快樂，在太古樓大家相處如一家人，夜不閉門，一起生活。昔日大家的生活節奏一致，且團體感非常強。當我們現在愈渴想昔日的回憶，則表示我們現在的生活愈得不到滿足。要觸發一個集體出現回憶，其中一定要出現的是一個相同的回憶觸發點或者稱之為平台。這平台讓大家的回憶得以站立繼而擴展。太古樓之友的共同平台就是象徵太古樓的明之剛神父，他代表了一個理想的神父的楷模、一個理想的生活的模式、一個理想人際相處的方式。明神父就是他們回憶的中心。太古樓給予我們一個新視點去再理解集體回憶的意思。

最後，是關於宗教信仰的反思。明神父代表的是一個宗教人物，但他的角色已經超越一個宗教人士。他會替居民找尋工作，成為一個中介人；他會向居民提供救濟品及醫療服務；他會替居民伸張正義。明神父充分利用一個團體去將天主教信仰展現，而在個人生活層面上，他幫助每一個居民追求生活意義。太古樓的研究使我們了解傳教士傳教的目的，似乎不是單純要一個人接受天主教信仰，而是渴望人的生命得到超拔。而傳教士擁有的異族文化背景，有時可以不會成為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反而擴闊一個群體的視野。

太古樓是一個空間，而這個空間保護著與它有回憶的人。俗語說「有瓦遮頭」。人的生命十分脆弱，所以我們要有空間保護。這些空間可以是具體、亦可以是抽象。

香港人自兒童開始已經缺乏空間：兒童缺乏活動空間；青年缺乏置業的空間；成人缺乏思考的空間。人之為人，除了在物質上得到滿足外，亦需要一個整全個體以致社會所需要的空間。

夏其龍

「太古樓及薄扶林區歷史發展」研究計劃策劃人

81

互動小劇場

附錄①

磚瓦不在，人情依舊，「體驗太古樓」考察導賞團的團友透過「互動小劇場」親身體驗太古樓人一天的生活。



「體驗太古樓」 — 考察導賞團

2012年4月

互動小劇場

卓灝賢

太古樓的原址除了一條石壘外，所有建築痕跡及道路規劃均不復見。為能令參加者更了解昔日太古樓居民的生活，我們製作了一個互動小劇場，在太古樓原址 — 薄扶林花園 — 上演，並邀請參加者扮演太古樓居民，好能親身體驗當年太古樓居民的生活。本劇的情節乃根據居民憶述的真實事件，篩選改編，濃縮為他們一天的生活。



角色	身分
小梅	2 號宿舍，聖華小學生
麥勤	9 號宿舍，聖華小學生，長大後成為神父
小玲	21 號宿舍，聖華小學生，負責派公教報
梁仔	37 號宿舍，聖華小學生
肥仔	45 號宿舍，聖華小學生，貪吃
梁生	37 號宿舍，梁仔父親，納匝肋員工
老何	19 號宿舍，牛奶公司接線生
小珍	23 號宿舍，聖華小學生
陳太	23 號宿舍，小珍母親，孕婦
明神父	巴黎外方傳教會神父，長鬍子，年長

Sc. 1 上班上學

小梅、麥勤、小玲、梁仔與肥仔一同上學

〔2、9、21、37號宿舍→聖華〕

肥仔逃學，偷沙梨

〔45號宿舍→神父住所〕

老何、梁生上班

〔19、37號宿舍→牛奶公司、納匝肋〕



Sc. 2 肥仔偷梨

小珍陪陳太看醫生，遇見偷梨的肥仔

小珍： 哦！肥仔又唔返學走去偷沙梨！

肥仔： 你夠唔返學咯！

陳太： 小珍陪我去診所睇醫生，順便去買餸，不如你都黎吖！

三人一起到薄扶林村買菜及上診所

〔23號宿舍→薄扶林村〕

〔買菜〕

Sc. 3 神父通渠

陳太回來發現老何宿舍外水渠淤塞

〔薄扶林村→19號宿舍外〕

小珍： 咦？點解成地都係水既？原來條水渠塞左呀！

陳太： 唉呀！老何返左工，邊度有人幫手整呀？

肥仔： 呀！我去搵明神父！佢一定肯幫手架！

〔19號宿舍→聖堂〕

陳太： 等我打個電話比老何先。



陳太回家打電話

〔19號宿舍→23號宿舍〕

〔打電話〕

老何： 喂？早晨，牛奶公司！

陳太： 喂？係咪老何呀？我係陳太呀，你屋企條水渠塞左，不過阿肥仔幫你搵緊明神父架喇！

老何： 哦！咁你記得同我多謝明神父呀！我今晚一定要準時收工先！

肥仔與明神父到達

〔聖堂→19號宿舍〕

神父： 陳太，小珍，肥仔，你地返屋企先啦！等我去得架喇！

眾人： 唔該晒你呀明神父！

〔陳太小珍回23號宿舍、肥仔回45號宿舍〕

明神父捲起雙袖通渠

Sc. 4 祈禱玩樂

小梅、麥勤、小玲、梁仔放學

〔聖華→宿舍外空地〕

小梅： 不如我地跳橡筋繩吖！

小玲： 拍紙仔好玩D！

梁仔： 咁悶！不如飛mug吖！

麥勤： 你地慢慢玩啦，我去聖堂祈禱。

小梅： 又去？麥勤，你想做神父呀？

麥勤： 你點知架？咁我走先喇，小梅，小玲，梁仔，你地玩得開心D啦！

眾人： 拜拜！

〔麥勤由空地→聖堂〕

小梅、小玲、梁仔繼續玩遊戲

〔梁仔拿玩具，毬／橡筋繩／拍紙仔…〕

Sc. 5 雪糕·派報

老何、梁生下班

〔牛奶公司、納匝肋→19號宿舍〕



老何： 明神父！唔該晒你呀！

神父： 唔駛！而家搞掂架喇！有事你再搵我啦！

〔神父由19號宿舍→神父宿舍〕

梁生： 阿仔！唔好玩喇！夠鐘返屋企食飯喇！

梁仔： 我想食雪糕！

梁生： 雪糕好貴架！細細杯都要三毫子，唔准食！

老何： （拿出雪糕）梁仔！你乖乖地做晒D功課我就請你食！

梁仔： 好野！

麥勤拿著一袋公教報來，提醒小玲派發

〔麥勤由聖堂→空地〕

麥勤： 小玲！今日係星期五，記得派公教報呀！

小玲： 係播！差D唔記得左添！（接過布袋，向梁生及小梅）比左你地先啦！

〔小玲派公教報給梁生及小梅〕

眾人散去

〔空地→2、9、37號宿舍〕

Sc. 6 新屋惡犬

小玲往第二座

〔空地→23號宿舍〕

小玲： 陳太！公教報！

陳太： 唔該！

〔小玲派公教報給陳太〕

小玲往第三座，遇見很多惡犬

〔23號宿舍→45號宿舍外〕

〔狗吠〕



小玲：肥仔!!!快D出黎收公教報呀!!!

肥仔：哦!(向狗)唔准嚟!

[狗收聲]

最後成功派給肥仔

Sc. 7 陳太臨盆

小玲回家

[45號宿舍→21號宿舍]

老何和小玲聽見陳太喊叫

[陳太喊聲]

[19、21號宿舍→23號宿舍]



老何：陳太!你無事吖嘛?

小珍：媽媽就黎生得喇!要去醫院呀!快D搵明神父幫手啦!

老何：好!我即刻去!

[23號宿舍 神父宿舍]

老何：明神父!陳太生得喇!你快D車佢去醫院啦!

神父：你地去扶佢過黎，我即刻去攞車!

眾人扶陳太到停車場，然後上車

[23號宿舍→停車場]

[宿舍→醫院]

Sc. 8 嬰孩誕生

陳太生下男嬰，眾人前往醫院探訪

[眾人聚集]

梁生：恭喜晒陳太!聽講係仔黎播!改左名未呀?

陳太：改左喇!叫志明!

[完]

角色原型

劇內所有角色均有其人，陳太誕下之男嬰陳志明正是當今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明之剛神父親身幫忙通渠亦為真事，他駕駛的車款和劇中所見的道具紙板車一樣，是一輛福士甲蟲車。本劇用了麵包作道具嬰兒，是因為當年彌撒聖祭所用的麵餅（未祝聖的聖體）正是由太古樓居民親手製作的。唯時空所限，本來橫跨幾代的故事均壓縮在本劇發生（例如陳志明副主教出生的年代未有電話），務求令大家認識更多關於太古樓居民的故事。

第一座

- 2 號宿舍 陳詠梅 樂鋒會會員，聖華小學學生；曾往南丫島宿營遇上十號風球
- 9 號宿舍 麥振群 成為慈幼會司鐸，親歷二次大戰，現於加拿大服務。劇中名字「麥勤」乃因撰寫劇本之時誤以名字為「麥振勤」之故

第二座

- 19 號宿舍 何燊培 拜託岳母請明神父通渠；半夜請明神父駕車送陳太到醫院產子，誕下志明
- 21 號宿舍 梁素玲 逢周五晚派公教報，派往新屋（第三座）遇惡犬；聖母軍團員，每週製作未祝聖的聖體麵餅
- 23 號宿舍 陳佩珍 長女，有十兄弟姊妹，七弟志明為當今香港教區副主教；另有弟弟德明，忠明；太公乃納匝肋員工；叔叔婚後舉家搬到太古樓，人丁興旺

第三座

- 37 號宿舍 梁有伴 聖華第二屆畢業生；父親乃納匝肋員工
- 45 號宿舍 馬兆桂 又名肥佬桂，輔祭，常跟明神父的甲蟲車往黃竹坑瑪利灣學校輔彌撒，又跟其步行往西環坐街渡往南丫島於教友家中參與彌撒，得嘗教友之盛宴款待

道具



小梅和其他小朋友玩橡筋繩



梁仔的太古樓紀念繩



肥仔往神父宿舍偷的沙梨



小玲拿著一大袋公教報，每週五晚派發



小珍替陳太拿餸菜，內有薯仔、蘿蔔和勞工棍



嬰兒是以毛巾包裹著的麵包



明神父用廁所泵通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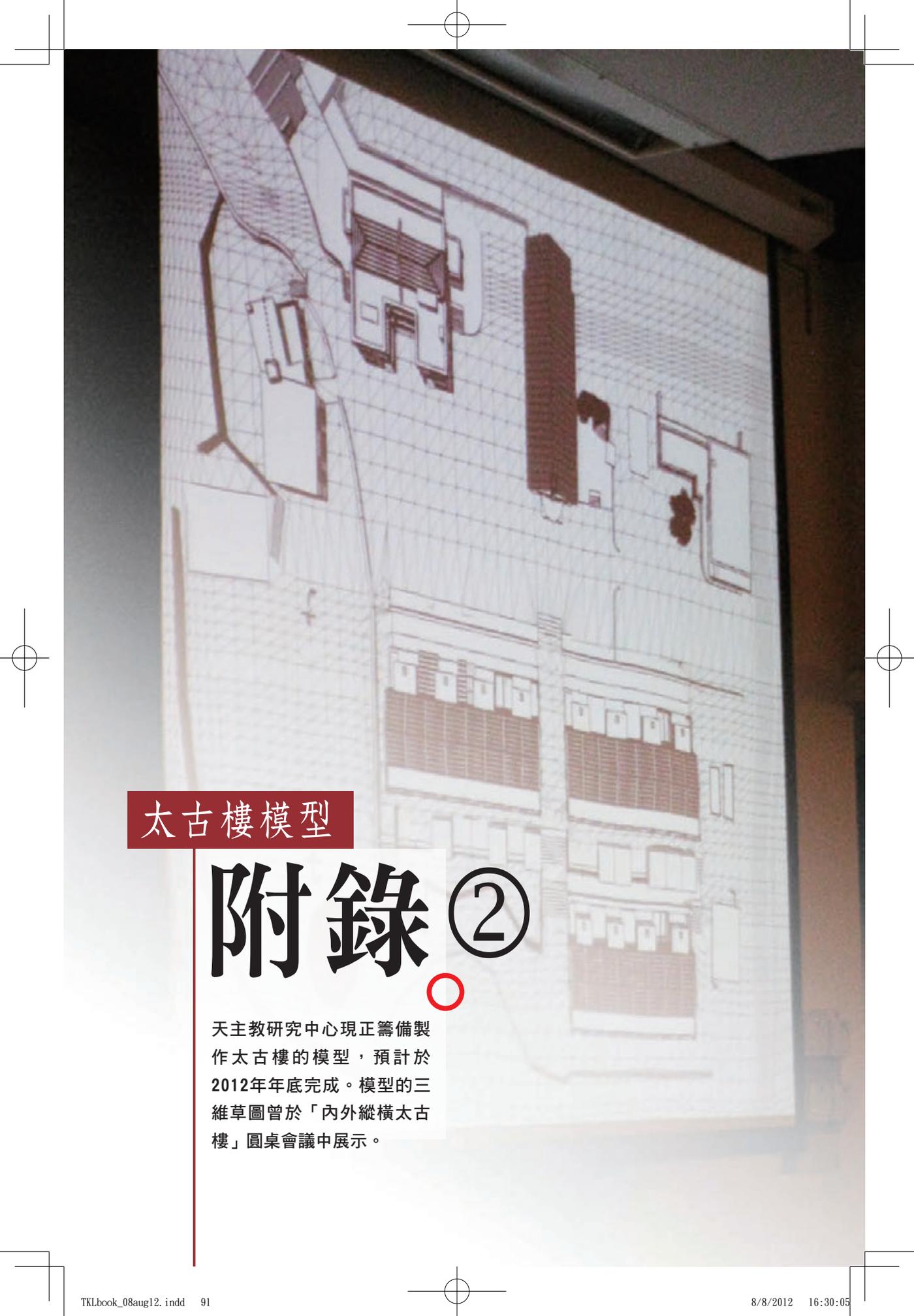
老何買了牛奶公司雪糕逗梁仔開心



新屋的惡犬



明神父的富士甲蟲車

A large architectural drawing of a building facade is projected onto a screen. The drawing is a technical sketch showing the structure of a multi-story building with various windows, balconies, and a central tower-like structure. The drawing is rendered in a light brown or sepia tone on a white background. The screen is set in a dark room, and the drawing is the central focus of the image.

太古樓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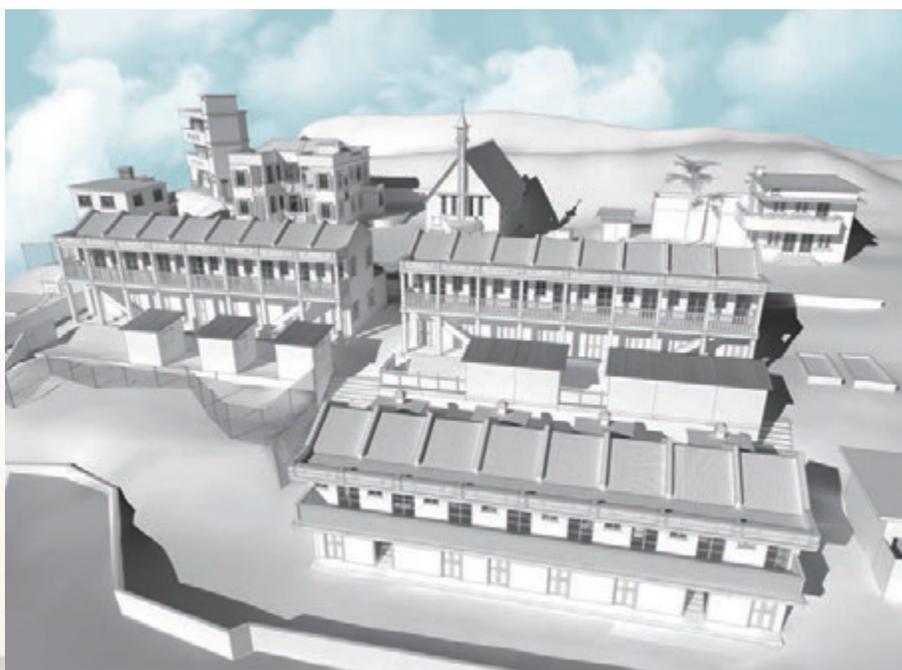
附錄②

天主教研究中心現正籌備製作太古樓的模型，預計於2012年年底完成。模型的三維草圖曾於「內外縱橫太古樓」圓桌會議中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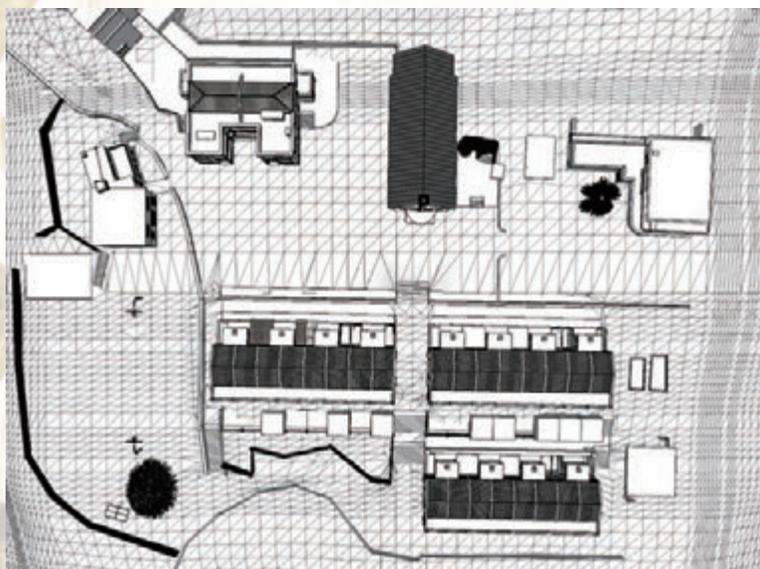
太古樓模型

特別鳴謝蔡籽昆、許家銓、邵靄怡、黃振宇、盧家康、黃澤培及 Christine Chung 為我們製作太古樓模型三維草圖。

92



太古樓全景



鳥瞰圖



露德聖母堂



修女住所



神父住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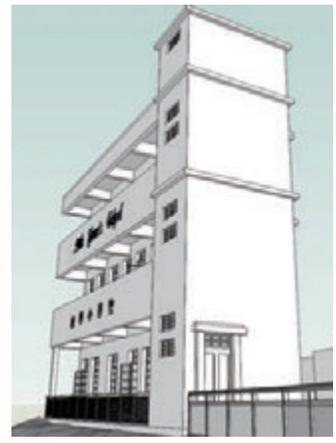
太古樓第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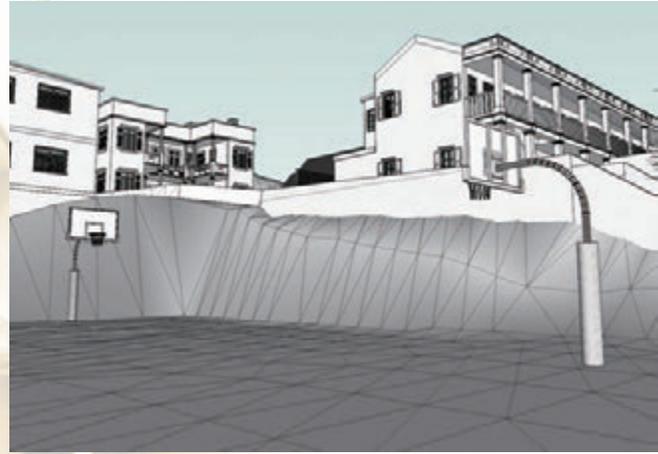
太古樓第三座



聖華小學舊校



聖華小學新校



球場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叢書

史料及工具系列 (8)：《內外縱橫太古樓—太古樓與薄扶林區歷史發展》

編者： 夏其龍
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電話：(852)3943 4277
傳真：(852)3942 0995
網址： www.cuhk.edu.hk/crs/catholic
電郵： catholic@cuhk.edu.hk
承印： 明愛印刷訓練中心
二零一二年八月初版
ISBN： 978-988-19046-8-3

Catholic Studies Publication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ference Tools Series (8): 《內外縱橫太古樓—太古樓
與薄扶林區歷史發展》

Editor: Louis HA
Publisher: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943 4277
Fax.: (852) 3942 0995
Website: www.cuhk.edu.hk/crs/catholic/
Email: catholic@cuhk.edu.hk
Printer: Caritas Printing Training Centre
First Edition: Aug 2012
ISBN: 978-988-19046-8-3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2 by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想知道更多有關太古樓居民的資料，可瀏覽「太古樓之友」網站：
<http://www.taikoolau.com>

